

第三章

北伐征途，峰迴路轉



飛將軍 蔣鼎文



一、出師未捷起波瀾

國民黨中央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北伐宣言》，七月九日，蔣介石在廣州就任北伐總司令之職，並在東校場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和閱兵儀式，由此拉開討伐北洋軍閥的帷幕。

黃埔軍校成立以後，國民黨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實力雖然還比較弱小，但其核心作用已不可小覷。近兩年來，廣州國民政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剷除境內大大小小的軍閥，完成了「兩廣」的統一。

對北伐，廣州國民政府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了步調。蔣介石通過三二〇事件的「高妙」操作，雖險象環生，終峰迴路轉，又順勢逼迫當時國民黨的核心人物汪精衛、胡漢民遠走他鄉；而蘇聯顧問也前倨後恭，事事順從，極力滿足蔣介石的尊榮心理。其時的蔣介石已是國民政府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六月四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次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繼之又任國民黨中常委主席。不僅軍權獨攬，且又成為國民黨內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威權之勢已超過孫中山擔任大元帥之時。

討伐推翻北洋軍閥，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誠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和宏願，蔣介石作為新晉的領袖，需要這麼大的一個舞臺去施展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當時全國實力最強的三個軍閥集團分布如下：直系軍閥吳佩孚盤踞湖北、湖南、河南及陝西、直隸一部分，控制京漢線及粵漢線北段，擁兵二十餘萬；另一支直系軍閥孫傳芳控制著江蘇、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及津浦線南段，自封為「五省聯軍總司令」，擁兵二十萬左右；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著北京中央政府和東北、山東、直隸一部、京津地區和鐵路津浦線北段，兵力最為強盛，

達三十五萬之多。

國民政府北伐軍的序列為：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黨代表繆斌；第二軍軍長譚延闓，副黨代表李富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黨代表朱克靖；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由副軍長陳可鈺代理），黨代表廖乾吾；第五軍軍長李福林，副黨代表李朗如；第六軍軍長程潛，副黨代表林伯渠；第七軍軍長李宗仁，黨代表黃紹竑；第八軍軍長唐生智，黨代表劉文島，共計八個軍，十萬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總參謀長李濟深留守廣州，其職權由總參謀次長白崇禧代行，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總顧問為鮑羅廷，加倫為軍事顧問。

北伐軍第一期戰鬥部署如下：

第四、第七、第八軍約五萬人擔任湖南戰場正面進攻。第四、七軍組成右路軍，第八軍為左路軍。第四軍進抵安仁後向攸縣集中，第七軍向永豐集中，兩軍集中完畢後，協同第八軍進擊敵軍。第八軍自衡山出發，俟第四、七軍集中完畢，協同殲敵。以上三軍均以攻佔長沙為戰鬥目標。

第二、第三、第六軍和第五軍之一部進入湘東、湘南一帶，警戒江西之敵。第二軍向桂陽、酃縣前進，一方面監視贛南敵軍，一方面掩護主力集中。第三軍集中茶陵，第六軍集中安仁，除監視江西方面敵人外，並策應正面進攻。第五軍第十六師之四十六團集中桂陽，除監視贛南敵軍外，保持與第二軍後方聯絡。

第一軍集中衡陽，作各方策應。為保證廣東安全，總參謀長兼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坐鎮廣州，統籌一切。

以上計畫下達各軍，在粵待發之部隊即按第四、第三、第二、第一、第六各軍和第五軍第十六師第四十六團次序，由粵漢鐵路廣韶段開始運輸，至八月五日均到達指定地點集中完畢。

蔣鼎文所在第一軍的兵力分佈是這樣的：

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率第三、十四兩師留守廣潮梅地區，既護衛廣東東部邊境，又防福建之敵。

第一師、第二師（師長劉峙）由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王柏齡率領。

蔣鼎文時任第二師第五團團長，其他兩個團的團長分別為陳繼承和惠東升。

然而蔣鼎文的第五團尚未出師即遭到意想不到的「損失」，原來他全團的軍餉在廣州天字型大小碼頭被小偷扒走。管理餉銀的軍需官黃湘水是蔣鼎文翊忠學堂的結盟兄弟。黃湘水，字竹虛，又名卓恕，在八個結義兄弟中排行老大，浙江諸暨墳山樓下畝人，為人誠實，精明能幹，最早追隨蔣鼎文到廣東投身革命，凡交他所辦之事，總是井井有條，因而蔣、黃公私兩誼，非常融洽，黃深得蔣鼎文信任的得力助手。

天字型大小碼頭坐落在日夜奔流的珠江邊，臨軍水馬龍的沿江路，熙來攘往，各色人等在此集聚，自是小偷扒手的樂園。那天黃湘水身揣銀票、路過碼頭之時，不知不覺間被小偷下了手，回到軍營，他恐慌萬狀地向蔣鼎文報告軍餉遭竊。蔣鼎文知道闖下大禍，急趨蔣介石總司令部面稟，遭致一頓大罵，然蔣畢竟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即令軍需處先全數補發，並告訴蔣鼎文，戰鬥結束後，他本人和失職者必須賠償歸還這筆軍費。

當蔣鼎文自憂轉喜回到團裡時，這邊卻傳來噩耗，原來軍需官黃湘水知道這一失誤非同小可，不但可能影響盟弟蔣鼎文的前程，更重要的是部隊不能按時開拔，影響北伐軍事部署，他羞愧難當，

自責過甚，一向自尊心、責任心極強的他竟急火攻心，重病而死。出師之前就損財折將，而且這不利消息迅速在各部傳播開來，引起指指點點，竊竊私議，這不吉之兆使蔣鼎文悲傷鬱悶到了極點。

他暗自思忖，唯有在戰鬥中衝鋒陷陣，多殺敵軍，才能回報蔣總司令如此「寬恕」，也才能告慰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盟兄之靈。

湖南是北伐軍的必經之地，軍事進展較為順利。北伐先遣部隊分別從桂、粵挺進湖南，配合原在湖南境內的唐生智第八軍先後攻克衡山、醴陵、長沙等城市。湖南省政府成立後，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長，從而標誌著北伐第一期作戰勝利結束。

八月上旬，蔣介石在長沙決定，繼續堅持出師前制定的先肅清湖南其他之敵，再會師武漢與國民軍聯合，徹底打垮北洋軍閥，統一全國的總方略。眼下先以北伐主力攻取吳佩孚部所盤踞的武漢重鎮，對孫傳芳所占的江西暫取守勢。

北伐軍發動第二期作戰自八月十八日始，陳可鈺所率第四軍、李宗仁所率第七軍和唐生智所率第八軍擔任正面進攻，而蔣鼎文所在的劉峙第二師作預備隊使用，



一九二六年蔣鼎文（左四穿西裝者）金蘭八友合影

經過多日血戰，北伐軍連克汀泗橋、賀勝橋等戰略要衝，於八月底直逼武昌城下。

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重要的軍事要地，又是華中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對於武昌的防守，吳佩孚頗為重視，他深知這或許是他政治軍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役，因而精心部署，以期全面打退北伐軍的進攻。

九月一日，蔣介石任命李宗仁為攻城總指揮，陳可鈺為副總指揮。蔣介石認為第一軍有攻取惠州城的經驗，決定由第一軍第二師帶頭衝鋒攻城，其他各軍依次跟上。三日凌晨，劉峙、蔣鼎文的第二師開始進攻武昌，並佔領了紫金山至忠孝門防地一角，然武昌守軍吳佩孚部居高臨下，用機槍密集掃射，攻擊部隊雖傷亡慘重，卻無大的進展，蔣見此不得不鳴金收兵。蔣介石又於五日再次組織攻城，但徒添傷亡，對堅固的武昌城依然莫可奈何。

鑒於兩次攻城受挫，蔣介石在六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採取嚴密封鎖包圍策略，禁止一切人員物資進出。武昌城已被北伐軍團團圍住，成了一座孤城，槍彈、糧食、醫藥奇缺，民怨沸騰，兵士傷亡慘重，重要守將意志動搖，終至十月十日，在攻守雙方的殊死搏鬥後被北伐軍攻佔。對於這場武昌攻堅戰，蔣鼎文有個回憶：

北伐的軍隊經過汀泗橋和賀勝橋之役，到了九月上旬已直薄武昌城下。北伐軍由詔關橫掃湖南，氣勢是非常旺盛的，所以對於武漢之戰有必勝的決心。進攻武昌時，唐生智任前敵總指揮，我仍擔任第一軍第二師的團長，這時葉挺在第四軍擔任獨立團團長。進攻武昌是第二師擔任右翼，第七軍的李宗仁和第四軍的陳可鈺為中間和右翼（確實的位置已不復記憶），這是進攻武

昌的主力，還有幾架簡陋的飛機。敵方的守備部隊是吳佩孚的武昌守備軍總司令劉玉春的第二師和第三師，以及武昌防禦總司令陳嘉謨的二十五師，都是一些精銳部隊。因為在吳佩孚看，武昌絕不能失，武昌一失，吳佩孚身後有奉張，連退都無地可退，因而下令死守。晚間我們以熾烈炮火攻城，城上的守軍猛烈還擊，我們士兵衝鋒爬城，城上的守軍用火把照亮城堞射擊。我們屢攻不下，改用坑道作業，一面加緊圍困，復用飛機轟炸。這樣一直打到十月中旬，敵人近乎彈盡援絕才投降。我們俘虜了劉玉春和陳嘉謨，光復了武昌和漢口，吳佩孚落荒地向河南退走，廣東的國民政府中一部分人也就到了漢口。

先前蔣介石見武昌久攻不下，乃將攻擊重心轉至江西南昌，同時將第二軍第二師劉峙部亦調至江西戰場，以作主力攻堅部隊。有不少書籍提到，蔣鼎文也參加了南昌之役，並且在戰鬥中負了傷。這些回憶文章或而有誤，文獻記載上似乎沒有依據支持這一說法，蔣鼎文在接受臺灣學者的訪談中也沒談到參與其事，其訪談是這樣敘述的：

至於江西的光復，主要功勞是擔任右翼的朱培德，他出力最大。敵方主力為孫傳芳部隊的鄧如琢和陳調元，當然陳調元的響應革命軍也是江西能夠早日光復的原因之一……我在武漢光復後，便調到總司令部工作。¹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六一—一七頁。

這一不期然的調離使蔣鼎文暫時離開了戰事第一線。

二、點編黔軍王天培

北伐軍師出湘、鄂途中，聲勢浩大，指向明確，一些割據的地方武裝見大勢所趨，紛紛要求加入北伐軍，共同北進。武漢攻克後，蔣介石為發展武裝，不拒細流，部隊的人數反而增加，編制也日趨龐雜。隨之，總司令部的事務大大增加，諸如調配、軍餉、協調都使他們的工作不堪重負。為此，蔣介石決定擴充總司令部，從第一線抽調既有宏觀視野、又有實踐經驗的中下級軍官到總司令部工作。蔣鼎文既有統帥部的參謀工作經歷，又熟稔軍隊的具體運作，因而被蔣介石點名上調，協助蔣介石處理大大小小的戰場事務調度。

還有一種說法，蔣介石對蔣鼎文在北伐開拔前失竊軍餉之事一直不快，認為失竊的軍費必須賠償歸還，因而在武漢攻下後，蔣鼎文返回諸暨老家，變賣家鄉田地，又向親友借款，湊足數額再返軍中。蔣介石依然以總司令部事繁為由，將其從戰事一線調離，轉入參謀工作。

有些地方武裝雖也一時順應潮流，但無疑有自己的盤算。如當時貴州駐湘西首領袁祖銘，靠攏北伐軍的態度很誠懇，要求廣州政府「懇予收容」。廣州國民政府亦任命他為國民軍左翼總指揮，其左右手彭漢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軍軍長，但袁部對北伐戰事行動遲滯不前，多採取觀望態度。

袁祖銘與第十軍軍長王天培是保定同學，王天培的心機似更深一些。王天培，字植之，號東俠，貴州天柱縣織雲鄉人，侗族，出生於當地一個農戶家庭。武昌陸軍第三中學畢業，參加了武昌起義，

隨後至保定軍官學校深造。後與彭漢章一起擁袁祖銘定黔成功，得任黔軍第二師師長，其後又附議參加了孫中山的護國護法運動。

王天培部改為國民軍北伐第十軍後，與已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的賀龍部發生過一次激烈的衝突。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二六年八月，蔣介石決定以所編第九軍、第十軍為左翼，先攻取湖北公安、石門，再奪取荊沙、宜昌，以掩護中路軍攻取武漢。當武漢、南昌相繼被北伐軍攻克後，第九、第十軍與長江北岸的第八軍夾江攻取宜昌。至十二月十七日，北洋軍長江上游總司令盧金山棄守宜昌，王天培的第十軍與賀龍所在部的第九軍進駐宜昌。北洋軍盧金山部武器精良，人高馬大，不願束手成為俘虜，於是伺機逃跑，賀龍則乘機解除其武裝，裝備低劣的賀師一下子成了擁槍一萬五千餘支、武器精良的「暴發戶」。據十二月二十九日長沙《大公報》報導，宜昌之役，僅賀師第二旅就「奪獲敵械步槍三千餘支，連槍百餘支，機關槍五挺，迫擊炮三門，子彈無算，輜重糧秣甚多，並俘虜數千名」。賀師官兵手中的毛瑟槍、九子連等舊式、土造武器全部換上了三八式、漢陽造。

看到賀龍所部如此巧妙地鳥槍換炮，王天培和隨後入城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鄂西前敵總指揮兼第二師師長何鍵嫉妒得發慌。王天培怒氣衝衝地派代表質問賀龍：「盧部已被十軍收編，你們怎麼把他們的槍提了！」賀龍也以硬碰硬，凜然回答：「槍是我提了，你們說怎麼辦！」王天培惱羞成怒，於是指責賀師「驚潰降卒，製造兵變」。隨之扣押賀龍師的軍餉，並與何鍵聯名向國民政府告狀，要求解除賀師武裝自從賀師繳了北洋軍槍械後，身兼宜昌城防司令的王天培就藉口整肅軍紀，派衛戍部隊成天抱著城防司令部的大令上街巡邏，碰上賀部官兵則想方設法找茬子，並以違犯軍紀為名抓去關押或拉到城外槍斃。賀龍所部也以牙還牙，以硬碰硬，一時雙方大有火拼之勢。

就在王、何妄圖一口吞掉賀師之際，國民黨中央委員吳玉章受武漢國民政府委派，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到宜昌調查處理此事。這位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辛亥革命人士，知道由共產黨員周逸群任師政治部主任的賀龍之師是一支深受中共影響的湘西民軍，惜護之心頓起。他嚴厲批駁王天培、何鍵解除賀師武裝的荒謬要求，提出把賀師調往武漢拱衛革命中心的和解方案，以免賀師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被王、何軍隊吃掉。

由於王天培長期擁兵西南一隅，已養成自大和投機心理，歷來都是占便宜多，此次面對賀龍的強硬，吃虧不說，還受到指責。如此便膨脹了縱掠宜昌的心理，因而搶劫之風在宜昌蔓延。對此，蔣介石甚為震怒。十二月二十六日，他電示鄧演達密派幹員前往宜昌，調查第九、第十軍進入宜昌後劫掠的範圍程度；又直接致電王天培，要他查明主使肇事官從嚴究辦。¹

各種情況顯示，王天培部軍紀渙散，冗兵冗員太多，蔣介石感到必須對其進行整編，乃下達命令，派朱霽青出任點編委員長，蔣鼎文為點編委員，即刻起程赴宜昌對王天培部就地點編整治。

朱霽青是資深的國民黨人，遼寧省北鎮人，與孫中山友善，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在東北發展組織，辛亥革命爆發，任民軍督府總參謀長。繼又返回奉天活動，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並出任師長，高舉反袁旗幟。一九二一年赴蘇俄考察，兩年後回國，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委，並隨北伐軍出征。由這位老資格的政軍兩界人士出任點編委員長，再配之以年富力強、精通軍事、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蔣鼎文，足可壓陣。即使黔軍再懶散驕矜，點編任務也可完成。

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四四頁。

朱、蔣一行到達宜昌時正碰上除夕之時，過年的氣氛已十分濃郁。王天培見點編大員抵達，自是不敢怠慢，因為其部隊的規模、個人的前途，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朱、蔣手中。他馬上盛情邀請朱、蔣聚餐，為他們洗塵接風。

王天培宴請客人有別樣的隆重，凡他所請客人入席後，即派手下幾位高大魁梧的衛士持槍在宴席間穿行，衛士的眼光不時在客人之間掃來掃去。這種奇怪的請客方式在雲貴一帶軍人之間已不見怪，但出此範圍，用這種「炫耀」式請客以示隆重，客人很不自在，不但不領情，反而極易增加莫名的反感。

朱霽青是一位正直人士，他推掉了王天培的宴請，還約束蔣鼎文等年輕軍官不准上街，不准購買土特產。對於這段點編經歷，蔣鼎文是如此回憶的：

我們乃由武漢前往沙市、宜昌點編王天培的部隊。朱老先生早期便參加了同盟會，是一位耿介之士，聽說以後加入了改組派，我當時也曾聽到他說出了很多對委員長不滿意的話。我此次隨他去沙市、宜昌後，以後就很少聽到他的消息，聽說並不得意。我們一行點編委員在靠近陰曆除夕抵達宜昌，宜昌已經臘鼓頻催，忙著過年，好像飯館都要歇業了。王天培對我們的招待隆重得很，發下請帖請我們吃飯，朱先生嚴辭拒絕，說接受點編的部隊長招待是反革命的行為。那時是軍事時期，我們只有服從命令，但是心中暗暗埋怨，這樣是不是有點過分了。宜昌與下江不同，我們想出去看一下，順便買點土特產，朱老先生都不准出去，怕我們行為不軌，同時

還說革命成功要廢除舊曆，有什麼好看的。¹

革命成功，就要廢除千年的傳統過年方式？這位黨國元老確有點「左」得可愛。朱霽青其時對蔣介石已嘖有煩言，頗為不滿。朱後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追隨汪精衛派系主要人物陳公博，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主張和活動以反蔣和反南京政府為目的，但未及一年，便被蔣取締，朱等一千人物被永遠開除出國民黨，這些是後話。

當時，王天培所部駐紮在宜昌、沙市的第十軍，名義上號稱有六個師，實際上真正兵力只有兩個師，且這兩個師也是老弱病殘，兵力虛誇，槍支缺少，實際戰鬥力與北伐其他軍隊相差甚遠。王部濫兵之所以這樣多，是因為貧瘠的貴州山區為了解決吃飯問題，當兵即就業，故爾冒領軍餉、虛報人數的事自然就發生了。

蔣鼎文他們點編王天培的部隊，王天培內心當然有牴觸，但又不敢當面發作。一則他的實力亮了底，再不能冒領軍餉；二則整編後，他的部隊要調防，就無法在宜昌收取地方稅收了；三則賀龍師取得了北洋軍盧金山部的槍械彈藥，壯大了隊伍，而他一無所獲，還受到武漢政府的批評整訓。因而他怨憤四起，時不時向同輩同僚發洩。王天培這種無端的發洩不知是否為其以後被蔣介石槍殺埋下伏筆。

當時同被點編整頓的萬耀煌對此有如此回憶：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一八頁。

總司令部派點驗委員朱霽青、蔣鼎文等來點驗部隊，他們對王天培的第十軍下的評語是「濫」，部隊年齡從十三、四歲到五十餘歲不等，有的彎腰駝背，有的人槍兩支，即步槍一支，鴉片槍一支；對何鍵的三十五軍評語是「驕」，該軍人員、武器都整齊；對於本師的評語是：確實認真，虛心求進，武器裝備不足，政治訓練第一，尤其本團的政治訓練為各團之冠。¹

宜昌的點編工作尚未完全告竣，蔣鼎文突然接到蔣介石的緊急命令，讓其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火速趕赴南昌總司令部限時報到，另有重要工作安排。蔣鼎文的前程峰迴路轉。

三、傷兵團長，不期而至

讓蔣鼎文速赴南昌報到的命令是由張群轉達的。張群，字嶽軍，四川成都人，蔣介石留學日本軍校時的同學。北伐軍總司令部移至南昌後，蔣介石即請張群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一職。蔣鼎文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份到達南昌的，行裝未卸，即去拜會張群，打聽蔣總司令調他此行的動向。張群向他述說了大概以後就逕領他去面見蔣介石。

蔣介石見蔣鼎文到來，先詢問朱霽青的一些情況以及所點編部隊的反映，蔣鼎文一一作了回答，旋即蔣介石把話題轉移：「銘三，這次讓你來，是讓你擔當只有你能夠擔當的一個任務。」蔣鼎文心裡咯噔了一下，還沒來得及表態，蔣介石就續上了話題：「這個任務我反覆考慮過人選，我認定只有你最合適，我相信你也不會推辭的。」話已說到這個分上，蔣鼎文自是表示願聽從總司令任何

1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三一—一三二頁。

安排。

原來北伐部隊進展迅速，兩湖、江西、福建相繼攻克，浙江、安徽也在攻佔中。此前，國民政府的部隊從未與北洋軍閥的吳佩孚、孫傳芳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戰鬥，特別是武昌、南昌兩城市的攻堅拉鋸戰使軍隊傷亡慘重，各地雖然也安置了一些傷兵醫治，但隨著總司令部設在南昌，一些傷兵也陸續轉移到南昌來，一時南昌城「傷滿為患」，多達萬餘人。而北伐軍包括蔣介石本人對如此多的傷兵無論在心理上、物質上還是醫療力量、應對上都缺乏足夠準備，因而亂象紛呈。蔣介石多次親至大醫院看望撫慰，但傷兵群起發洩不滿，特別是肉體上的疼痛折磨進一步導致他們罵街罵娘、要錢要藥，一時輿情洶湧，動刀動槍乃至上街武裝搶奪的事情已多次發生。老百姓對持槍傷兵見到就跑，避之恐不及，因而社會治安、傷亡事故頻發。如何安撫平定這群無羈的傷兵成為蔣介石的一塊心頭大病。

後院起火使蔣介石想到膽識超群的蔣鼎文，由蔣鼎文出面，把這批傷兵的安撫、醫治、復員、從軍諸事一攬子承擔起來，於是創設成立了一個傷兵團，又名警衛團，由蔣鼎文出任團長。

蔣鼎文報到後，蔣介石即通知南昌各大醫院，凡能移動的傷兵均來集中開會，結果到會者三千多人，其餘的抗命不來。蔣介石站在臺上作了聲情並茂的訓話：「諸位兄弟，你們為黨國喋血疆場，獻身革命，流血流汗，是無上光榮的，不但我個人尊敬你們，對你們另眼看待，全國老百姓也都尊敬你們。但如果你們忍受不得一時痛苦，不時上街擾亂搶奪，像今天不少人又拒來聽講，這樣做是沒有軍紀的表現，這樣下去，你們會失掉全國人民對你們的尊敬，也會失掉全國團結一致的民心，人民就會怕我們。這樣我們的革命便要前功盡棄，我們的鮮血就要白流，你們想一想，這是多麼令

人痛心的事。」

全場的雜訊漸漸平息下來，傷兵們豎起耳朵要聽聽蔣總司令還有何話要說。蔣介石繼續說道：「你們在戰場上不幸受傷，我與你們一樣心痛。希望你們忍受今日之傷痛，以成來日之奇勳。為此我選派了一位一樣與你們受過傷痛，又建過大功的蔣鼎文來與你們共渡人生難關。」

蔣介石命蔣鼎文走上台臺，蔣鼎文隨之向臺下的眾多傷兵鞠躬致意。

蔣介石又說道：「這位蔣鼎文，我想你們也聽說過，有些人還認識，他在戰場上受過非常重的傷，靠著忍耐堅毅，配合醫生治療，九死一生，終於挺過來了。所以你們經歷過的危險，感受過的傷痛，蔣鼎文都是一一親嘗過的。」

臺下肅靜一片。

「我作為總司令，雖時時刻刻惦記著、掛念著你們，但我還要率部隊向北邊進軍，還要去爭取更大的勝利。因而我把對你們的囑託全部交給蔣鼎文來擔當。由他出面組成一個警衛團，並擔任警衛團少將團長，直屬我北伐總司令部領導。」

蔣介石講畢，蔣鼎文上臺簡單地講了幾句：「總司令命我這位傷者來擔任你們的團長，希望你們能體察總司令的良苦用心。我作為一個傷兵過來人，今後日子將與你們休戚與共，痛癢相關。我們雖然是警衛團，實是一個傷兵團，在你們的傷病未醫治好之前，我保證你們不擔任任何勤務，而且保證對你們有好的安排。同時根據總司令的指示，凡今天到場的官兵，均予登記名錄，稍後每人發銀元五塊，這是蔣總司令對你們的關懷體察，作為士兵，你們要感恩擁戴總司令。」¹

¹ 參見一九三五年印行《蔣氏宗譜·宣慰傷兵紀事》、《蔣鼎文將軍紀念文集》、《口述歷史》第九期。

臺下一片歡騰。歡騰之後就是一大堆麻煩，且麻煩混亂的情況遠比蔣鼎文這位新任少將團長所預料的要複雜得多。

北伐軍自廣東出師以來已逾半年，戰況的激烈使各地傷兵已達三萬多人，鑒此，在南昌一地設傷兵總院，下有二十多所收治傷兵的分院，在南昌已收治傷兵萬餘人。這些傷兵儘量按照原部隊編制安置，由於重傷者不少，再加上人員眾多，一時缺醫少藥在所難免。如此多的傷兵，成分複雜，心理扭曲，肉體痛苦，因而在索餉、索醫、索待遇方面往往有過高的要求，且易產生群體效應，稍有不滿足，就生怨懟，怨懟者之間又互相煽動，範圍不斷擴大，乃至各省傷兵都有聯絡，並私下成立了嚴密的傷兵組織。當聽到總司令部委派蔣鼎文來管理，不少傷兵紛紛揚言，不滿足我們的條件，絕不聽從蔣鼎文的指揮，並放出風聲，讓蔣鼎文小心為上。

這確為難了蔣鼎文，因為蔣介石在訓話完畢即東下指揮北伐戰事去了。

當未赴會者傷兵打聽到聽訓者發到五塊銀圓以後，瞬時雲集，三五成群，結伴趕去責問蔣鼎文，他們為什麼沒有？難道他們不是傷兵？難道他們不是革命軍人？一些激進的傷者衝到蔣鼎文的團部，罵了還不過癮，又對蔣鼎文施以拳腳，衛士要上前制止，蔣鼎文喝令不准還手，任由傷兵痛毆解氣才罷。

在如此紛亂的情況下，蔣鼎文覺得眼下最緊要解決的有三件事：第一，盡快成立傷兵團的組織；第二，五塊銀圓必須補發到每個傷患；第三，要儘快設法走遍二十多所病院，與傷者直接接觸，以便掌握更多情況，同時與他們多聯絡感情，儘量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傷兵團主要崗位人員即告到位，副團長由張炯（劍吾）擔任，團附為李唐，第一營營長張本清，

第二營營長蘇文欽，第三營營長凌光亞。

為防止傷兵進一步尋釁鬧事，蔣鼎文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對凡在南昌的傷兵，即使上次未到會的六千多傷兵也依例發放五塊銀圓，這才稍平群憤。

第三件要事是怎麼走進傷兵醫院了。其時的傷兵雖來自各地，也有點「各自為戰」，可抵觸心理是一致的。有許多醫院甚至設置陣地，武裝抗拒蔣鼎文他們進入。蔣鼎文也知道，如果沒有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就貿然去強行收編各部隊的萬餘名傷兵，不但無法辦到，於事無補，且還可能釀成武裝事變。蔣鼎文首先想到了第一軍的傷兵，自己是第一軍出身，是其中的一個團長，第一軍畢竟是蔣介石的起家部隊，上下官兵從心理上、感情上對他們更服膺一些，這樣溝通起來就方便多了。

於是蔣鼎文設法疏通好第一軍的傷患，讓他們在醫院內部聯絡安撫其他部隊傷兵，以便他這個新任團長能夠進入醫院去講話。

蔣鼎文決定不攜槍支，不帶衛兵，孤身一人赴醫院做工作。即使這樣，傷兵亦手握槍械和手榴彈，環伺迎接。蔣鼎文強裝鎮靜，笑吟吟地說：「我奉蔣總司令之令與你們來甘苦與共，你們卻這樣盛情地迎接我。我今天匹馬一人與你們來談談心，且允我講話完畢，如無道理，你們可以轟走我，甚至可以處置我。」

一些明事理且資歷老的傷兵告誡其他人：「慢著，別胡來，且聽他講完後，我們再作計議也遲。」

蔣鼎文說：「兄弟們，我亦是傷兵中的一員，為黨國出生入死十多年了，風風雨雨才有現在。

今天我置個人生死於度外，而以你們幾千人生死為前提，你們如欲武裝拒迎總司令部委派的官員，實是武裝對抗蔣總司令，也實是犯上不恭，是軍紀不允許的。你們想想，蔣總司令對幾十萬的強敵都不懼怕，怎麼可能怕你們幾千傷兵！」

話語軟中帶硬，卻句句是實情。傷兵們默不作聲，有些領首稱是。

蔣鼎文又說道：「我是受過重傷的人，在鬼門關上進出了好幾次，一條命已經賺了，但我不忍心我們的幾千名傷兵兄弟，不是在戰場上繼續奮戰，建功立業，而是在自己內部做出違反常理乃至武裝對抗的事，從而毀掉你們的前程乃至生命。我向你們保證，原已作過的出格之事，一筆勾銷，不再重提，但要求你們今後不能重犯了。作為傷兵團長，我以你們之思為我心中之思，以你們肉體之痛為我身上切膚之痛，同時也希望你們幫助我這個團長做好這份工作，我們大家一起齊心協力，出謀劃策，共圖大家來日美好前程。」¹

如此軟硬兼施、恩威並用，來勢洶洶的傷兵武裝對抗事件竟在蔣鼎文以心貼心、苦口婆心的勸解下暫告化解。

對於傷兵的集體武裝鬧事，其時寧漢分裂的上層政治舉動也或多或少影響到軍隊中來。按照蔣鼎文他們的觀察，又說是共產黨滲透煽動引起，尚未見到依據，或是誇大其辭。

李宗仁則有他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身為國民革命軍和統帥，「然其意念總是以第一軍為主體。軍中一切彈械補充、給養調劑、編制擴展等，第一軍常比他軍為優厚。例如江西肅清後，嚴霜如雪，嶺南子弟不慣於寒冷氣候，多已瑟縮難耐，然後方軍毯運到時，蔣總司令即面諭兵部總監俞

¹ 分見《蔣氏宗譜·宣慰傷兵紀事》、《蔣鼎文將軍紀念文集》、《口述歷史》第九期。

飛鵬，就第一軍傷兵醫院優先發給，此外賞賜慰勞銀元也照此辦理。俞謂：「每一醫院中都有各軍的傷兵，當如何應付？」蔣說：「不管，不管，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軍長！」蔣氏此話，顯然忘卻其主帥的地位，而仍以第一軍軍長自居。他這種作風，可能故意使第一軍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軍官兵對第一軍發生嚮往羨慕之心。然事實上，他所得的結果反而是友軍懷怨不平，部曲離心。」¹

其時，各軍和地方武裝雖然舉起了北伐的大旗，但各有自己的私下打算，所以一遇到動盪不定的環境，有適於鬧事的溫床，群體抗拒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武裝起義爆發後，頓時上下震動。起義的部隊有不少與傷兵團的人員互相熟識，因而部隊中的傷癒之員也有跟隨前往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使蔣鼎文措手不及，而其時南昌總司令部幾乎人去樓空。總參議張群原留守南昌，後因急事而出湖口奔赴南京了；南昌行營主任李烈鈞也因有事急待處理，由河口奔赴武寧故里，轉而去南京；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幹不下去，亦離開南昌。一時間，原先人聲鼎沸、車來人往、要人雲集的南昌城已無人主持軍政大事。

中共領導人則抓住這個機會，一邊鼓動傷兵團的人員加入起義隊伍，與他們一起幹革命，一邊則在南昌城內貼出「打倒蔣介石」、「擊殺蔣鼎文」的標語，廣造革命輿論。這使這個本是人心不穩、各路人馬臨時湊合的隊伍再顯動蕩，頓時之間，蔣鼎文的傷兵團有立馬解體的可能。

在如此紛繁的環境下，傷兵團何去何從，只有蔣鼎文一個人拿主意了。

蔣鼎文與團營級官員會商後決定，帶領這批人撤離南昌，奔赴南京。輕傷者歸隊執勤，未癒者繼續到南京治療。當時嚴峻的現實是給養的問題，在南昌之時，北伐革命軍給蔣鼎文的傷兵團發了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三一五—三一六頁。

六個月軍餉，但都是紙幣。紙幣在南昌尚可通行，但出了江西到浙江、江蘇，就沒有人願意接收了。而三千多傷兵每天的開銷不小，一天也不能脫節。蔣鼎文決定自己打頭站解決這個頭號難題，部隊由副團長張炯帶領梯次開拔。每到一地，蔣鼎文都與各縣政府和地方商會商談，述說他們碰到的困境，請求他們借給傷兵團每人二塊銀圓，並以他們手中的紙幣作抵押，講定如果將來紙幣流通了，就以抵押的紙幣歸還，如果紙幣未能流通，則由國民革命軍負責償還本息。憑藉著浙江老鄉人頭較熟的關係，各縣地方政府和商會亦予以相助，如此一路仿效，終於解決了他們吃飯換藥的問題。傷兵團沿途行軍的線路為餘江、貴溪、弋陽、橫峰、上饒、玉山、常山、龍游、蘭溪、富陽、杭州、嘉興等地，隨之進入蘇錫常而入南京城，三千多傷兵一路安然無恙，然後安置在棲霞山繼續醫療休養和訓練。

對於這段經歷，蔣鼎文既感到印象深刻又心力交瘁，幾十年後他還記憶猶新：

從南昌到南京這一段行軍，是我從軍以來最艱苦的一次行軍，傷兵的心理不正常，沒有經過嚴格的組訓，沿途沒有兵站，補給無著，這都是對於傷兵沒有政策所造成的惡果。有了這一次經驗，所以抗戰一起，我便大聲疾呼，籲請國家注意傷兵問題。處理傷患最困難，他們自己以為替國家流了血，容易產生不正常的心理，情感又比較脆弱，容易衝動，應付稍有不當就會滋事，對士氣民心影響極大。¹

¹ 分見《蔣氏宗譜·宣慰傷兵紀事》、《蔣鼎文將軍紀念文集》、《口述歷史》第九期。

傷兵團到達南京不久即投入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戰鬥。原來孫傳芳部與北伐軍相持於棲霞山與龍潭之間，其間北伐軍屢戰失利，孫傳芳軍一度攻入南京城內，而城內國民政府並無大的駐軍，傷兵團一些傷勢較輕的官兵一千多人，在張本清的率領之下開赴火線，展開頑強狙擊，在兩軍夾擊之下，孫傳芳軍終於退出南京城，從而扭轉戰場不利勢頭。

這次組建統領傷兵團雖僅半年餘時間，卻全面地錘煉了蔣鼎文的統兵能力。把一批桀驁不馴、聚眾鬧事、自恃有功、來自各支部隊又成分不一的傷兵組成了一支頗有戰鬥力的隊伍；再把一支已少人問津且已失去餉銀來源的三千多人的隊伍，跨越三省帶至南京，歸入大部隊建置，並即刻建立戰功，確屬不易。這樣的獨特經歷，為蔣鼎文以後指揮部隊平添了一筆財富，也讓蔣介石從另一個側面瞭解到蔣鼎文的不凡能力。

四、剪徑月黑風高中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內部的遷都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東征討蔣和為應對武漢討伐而抽調前線主力部隊進行防禦，這一部署導致徐州守衛兵力空虛，以致一潰千里。加之桂系將領逼宮，面對內外交困，茫無頭緒，又瀕臨分裂的複雜局面，蔣介石決定以退為進，辭去北伐軍總司令一職。

八月十二日，蔣介石主持召开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研究討論他的辭職問題。到會的李宗仁、李濟深、李烈鈞、白崇禧都明確同意蔣介石下臺「休息」。其中白崇禧是這樣說的：「總司令太辛苦了，應當休息休息，讓我們試試看吧。」蔣介石心有不甘，徵詢他黃埔系手下第一大將何應欽的

意見：「敬之，你對我辭職問題持何看法呢？」不料何應欽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在當前的形勢下，我也只能同意他們的建議。」¹

次日，蔣介石召開高級將領會議，述說自己即將離開大家，準備出國考察。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等將領先後發言，擁護蔣介石下野的決定，但到會的近三分之一將領則不同意蔣介石辭職，其中蔣鼎文、衛立煌、譚曙卿等態度尤為激烈，他們認為現在北伐戰事正處關鍵時刻，要完成統一，只有請蔣總司令領導，如果總司令此時離開軍事前線出國考察，對戰事非常不利，並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何應欽同意蔣介石辭職，就連他多年的戰友劉峙、顧祝同也靜默附和。蔣鼎文對此表示非常的不解，直至近四十年後，蔣鼎文還是無法釋懷，他是如此評述此事的：

等到京滬光復，革命軍勝利會師，政治上卻發生了很大波瀾。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和武漢政府的人逼迫委員長下野，委員長自己認為軍事行動尚未結束，不當下野。在這種情況下，何應欽是應該明白地表示出擁護委員長的態度才合道理。可是何的立場曖昧，不大同情委員長，反而與李、白接近。何與李、白是經過祝紹周的關係搭上的，他們倡出川雲貴西南大同鄉的關係，自然比較容易接近了。軍人之中連何應欽都不同情委員長，委員長只有下野以謀取革命軍的團結。委員長的下野是光明磊落的，事後顧祝同、劉峙親口告訴我說：當時他們對政治意識

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五七頁。

很模糊，認為何應欽是長官，應該服從他，因為何應欽是服從委員長長的，哪知道政治上會有這樣的微妙關係。¹

散會後，蔣鼎文急忙趕到蔣介石的住所，表示自己堅決不同意總司令離開，還引經據典地講了一大堆道理。但蔣的下野已是出弦之箭，豈能收回。同時蔣介石內心的城府也是此時的蔣鼎文所不能揣摩的。蔣介石叮囑蔣鼎文，他到奉化先小住一段時間，待稍作安定後，要蔣鼎文趕到奉化來晤談。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點，蔣介石乘火車離開南京，在上海略作停留後於晚十一點抵達杭州。前浙江省主席張靜江、省軍事廳廳長兼省防軍司令蔣伯誠等前往火車站迎接。次日，蔣介石發表正式通電：「余自受命黨國，出師北伐，已茲一年。環顧四周情況，黨國呈分裂之兆，人民貧困。國民黨之大業，在再不見發展。推其原因，實共產黨之陰謀所致。然武漢同志等不查原因，誹謗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黨之利益，故余毫不躊躇，即刻下野。」²

在杭盤桓幾日間，蔣介石交代蔣伯誠辦成了一樁他日後還在稱道的大事，即讓蔣伯誠設法以浙江省省防軍的名義，送黃埔系畢業生宋希濂、竺鳴濤、彭孟緝等二十二入赴日本學習軍事，從而為他日後東山再起蓄積了一批得力幹將。

同時發生的另一樁事情則使蔣介石極為不快。即新任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軍軍長周鳳岐派人給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一頁。

² 轉引王舜祁：《蔣介石三次下野》，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一六頁。

蔣介石送來了五萬元現錢，要求蔣介石趕快離開浙江，以免妨礙他行事。對於這禮送的「逐客令」，蔣介石當即向蔣伯誠表示出自己的憤怒。蔣伯誠勸蔣介石從長計議，暫時忍讓，他在合適的時機，一定會作出讓總司令感到滿意的反應。

蔣介石到達奉化不久，蔣鼎文從南京趕到奉化看望。蔣介石與蔣鼎文作了一番長談，並把他的打算也說了個大概。同時讓蔣鼎文不要返回南京，留在寧波，出任浙東警備副司令兼寧波公安局局長一職。未幾，原警備司令王俊調任另職，蔣鼎文自然扶正。對此，蔣介石主要有兩點考慮。第一，他剛一下野，就有人表示不敬，以後還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在奉化期間，必須有能幹且忠心耿耿的人保衛他的安全，轉達他的意旨，為他辦理當時他不便出面辦理的一些事情。第二，寧波、紹興地區他先前安排著十個（一說七個）徒手兵團在訓練，這批人原準備補充到第一軍去充實兵力，現在他下野了，不但不能按照原先計畫實施，而且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南京政府已有嚴格的防備，並準備解散他們；寧漢分裂後，一批在武漢的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追隨他跑到浙江來，向蔣介石報到，信誓旦旦要求從軍報國，他又不能拂卻他們的一腔熱血。然要命的是，這批軍政骨幹因沒有列入軍隊預算，餉銀經費無從來源，如無費用，那麼這批人很快會星散四方。於是蔣介石要蔣鼎文跑到杭州去，向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六軍軍長周鳳岐索要經費。

蔣鼎文滿口答應，他認為其時的浙江省政府，尤其是二十六軍主要軍官幾乎都是他的小老鄉和親朋師友，即使周鳳岐一時不願意，他也可以遊說周圍的師友，這樣周鳳岐總不至於不撥錢吧。

蔣鼎文所想確有道理。

周鳳岐是浙江老資格的軍政要人，係浙江長興人氏。辛亥革命前夕，蔣尊簋創辦浙江陸軍弁目

學堂，周被蔣錄用為弁目學生隊官，後又為浙江陸軍第二標一營右隊隊官、學兵隊隊長，所表現出的才幹深受蔣尊簋器重，並由蔣保送至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深造。周平生自視甚高，且目空一切，但唯蔣尊簋馬首是瞻。先為孫傳芳浙軍二師師長，後北伐軍興，劍指浙江，周則易幟響應，向國民政府輸誠，所部改編成第二十六軍，並出任軍長。周鳳岐的妻子是諸暨斯宅人，與時任第二十六軍參謀長郭懌的妻子是親姐妹，軍長與參謀長成為了一對連襟。

蔣伯誠是蔣鼎文的同族長輩，是何應欽第一軍的參謀長，從福建入閩進而入浙，北伐抵定杭州，留在浙江，任軍事廳長兼省防軍司令，代表何應欽行使職權，蔣伯誠又與蔣介石甚為契合。

斯烈亦是諸暨斯宅人，早年畢業於浙江講武學堂，曾應蔣尊簋之邀赴廣西陸軍小學任教，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的老師。辛亥革命後隨蔣尊簋返浙，任浙江都督府副官長。後與蔣尊簋、周鳳岐共舉獨立義旗，遭通緝後幾次逃往日本。其後任浙軍二師旅長，與蔣介石一直有聯繫。北伐軍李宗仁部自贛攻擊孫傳芳軍時，蔣介石特地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致電李宗仁：「駐九江之浙軍周（鳳岐）斯（烈）旅，向有接洽，請貴部速向九江前進；並請與斯（烈）旅以中正名義聯絡，勿使誤會。」¹李部兵不血刃，而斯烈所部也會同北伐軍由閩入浙，進而進駐上海，其時斯被任命為第二十六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第二師是上海四一二事件時的主要軍事武裝，斯烈曾拘捕了正在上海指揮工人運動的周恩來，後經其胞弟、黃埔三期畢業生、時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的斯勵勸說，斯烈冒著風險，巧妙地釋放了周恩來。斯烈曾任諸暨旅杭同鄉會負責人，蔣鼎文在杭時經常去拜訪他、請教他，是蔣鼎文的同鄉前輩。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六頁。

第二十六軍參謀長郭懌是諸暨東山吳村人。郭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畢業後一直在浙江陸軍任職，歷任排長、連長、營長、炮兵團長、旅長等職。

還有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陳時驥，諸暨楓橋人，時任第二十六軍第二師第四團團長，亦與蔣鼎文交誼非淺。

其時旅次在杭的上海政治分會主席、軍事名家，既是周鳳岐的恩師，也是蔣鼎文軍事生涯的重要領路人蔣尊簋就更不用說了。

蔣鼎文的信心滿懷還是有他所憑，因而他風風火火地從寧波跑到杭州，先到幾個同鄉友人處轉了圈，然後就直奔周鳳岐的辦公室。周鳳岐對蔣鼎文的接待頗為熱情，噓寒問暖，追敘多年友情。周鳳岐當然知道他是蔣介石的親信，所以言談之中又多了些防範。當蔣鼎文轉入正題，說明此行來意，要周主席給在寧紹的十個徒手團及黃埔軍校第四期在浙學生撥付經費時，周鳳岐即打起了哈哈，任憑蔣鼎文舌燦蓮花，搬出千百條理由，就是不為所動。而當蔣鼎文語調升高時，周鳳岐則打起了官腔：「銘三兄，你所說的這批人不屬於軍隊序列，我無法撥付經費。你們一定要撥付，只有請南京政府給我下達指示。如此，我才好奉令而行。」

蔣鼎文憤然離開，又去求助於蔣尊簋。然蔣鼎文所不瞭解的是，蔣尊簋此時對蔣介石也頗有看法，他亦認為周鳳岐不應該撥付這筆款項。

這次杭州之行，確給蔣鼎文上了生動的一課，什麼同鄉情誼，什麼師友僚屬，在政治面前統統不堪一擊。為此他大為感歎：「政治上的事真是非常現實，連浙江的周鳳岐都與李（宗仁）、白（崇

禧）攪到一起了。」¹

蔣鼎文悻悻然，兩手空空回到奉化，向蔣介石面紅耳赤匯報此次赴杭經過，這下蔣介石可來火氣了。第一次，周鳳岐不知天高地厚，向他下「逐客令」，他雖辭去了總司令一職，但畢竟還兼著浙江省政府委員，是在職之人呢；第二次，雖然是蔣鼎文出面要經費給養，然明眼人都知道，蔣鼎文是奉他蔣某人命令而去的，周鳳岐這樣斷然拒絕，豈不是又給他難堪。

蔣介石在大罵周鳳岐混蛋的同時，又痛罵蔣鼎文無能、無用。蔣氣沖沖地說：「銘三，你手上拿的是什麼？」蔣鼎文一時回不過神來，蔣介石又連珠炮似的吐出話語來：「你手上拿的不是燒火棍！人家不給錢，難道你讓這批人餓死不成。」原來，由於缺乏經費，有些補充團人員已作鳥獸散。但蔣鼎文一時還不明總司令的意圖，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此時蔣介石口氣緩和了下來：「銘三，你現在有浙東的地盤，手中有槍，去，到錢塘江邊設卡收稅去。」²

總司令的指點使蔣鼎文恍然大悟，於是他即調動軍隊和補充團黃埔系官員，再奔杭州，在江津口岸，在交通要道設卡收稅，社會輿論頓時譁然。

一言不合，一事不成，就要強行武裝收取稅賦，這種非政府的軍事行為豈不是明火執仗的剪徑之舉。

這一下，浙江省政府主席周鳳岐慌了神，而且南京政府也知道此事，急令周鳳岐迅速處理好此事。朝野的壓力迫使周鳳岐請出「蔣家」的人來解決問題，於是浙江省政府委派軍事廳廳長蔣伯誠、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一頁。

2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二頁。

教育廳廳長蔣夢麟作為全權代表，跑到錢塘江邊與蔣鼎文展開談判。

蔣鼎文向「二蔣」傾吐了他們這樣做是迫不得已，並說是周主席逼迫他們上「梁山」的。對於蔣鼎文這樣做，蔣夢麟原先還不太清楚內情，然蔣伯誠是明白的，只是他作為省政府成員，在當時不便公開反對周鳳岐的做法。這次有了臺階，於是讓蔣鼎文按實造出經費預算，由省政府全額撥給。隨之，蔣鼎文所設的武裝哨卡也全部撤除。

哪知這波剛平息，另一風波又起來。

周鳳岐是浙江軍政界早期的風雲人物，周順應北伐時勢，將浙江的軍隊納入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序列。歸順後，周雖亦服從蔣介石的調度，但與桂系的淵源更深。周在陸大時與李濟深為同學，兩人交誼甚篤；周部參加東路軍作戰，即是在白崇禧指揮之下，當二十六軍駐上海時，白為上海戒嚴司令，周為副司令，二人配合默契。白崇禧又是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斯烈的學生，因而白亦稱周鳳岐為老師，對周鳳岐和斯烈所部行文多用便箋，關係親切且隨便。周鳳岐出任浙江省主席，實是李、白的安排，可以說，周與李、白是聯合反蔣的同盟軍。

周鳳岐控制浙江地盤的慾念很強，自擔任省主席以後，即以浙江政治分會及省政府主席名義改組了浙江省黨部，把蔣和陳（果夫）所安排的幾個省黨部委員全部免去。

還有，周鳳岐竟要撤換蔣介石、何應欽都極為信任的蔣伯誠所任浙江省防軍指揮官一職，且是在蔣伯誠因公幹離杭期間撤換。當時北伐軍初入杭州，蔣要何應欽主持浙江政局，因何還要率軍北上，他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便留下自己的參謀長蔣伯誠代行其職權。蔣伯誠的無端被撤換引起了蔣、何的同時憤慨。

蔣介石其時雖然下野，然實際上仍操控南京政府，識時務的國民黨中央和不少省、市政府紛紛致函電蔣，促其早日復出。周鳳岐作為浙江省地方主管不但無片言隻字表示，反而發出安民布告，謂浙江治安由省主席負責，至於一人之去留，實與大局無關，要浙江人民「安居樂業，無相驚擾」。

周的一連串舉動促使蔣介石要對周有所動作，只是礙於「在野」之身，一時不便發作。導火線終於來了。當時蔣介石以東渡日本為由，要求浙江省政府撥十萬元作旅費，可周鳳岐斷然拒絕，說什麼一個卸任的總司令，憑什麼資格來要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蔣介石向時任安徽省主席，也是周鳳岐的陸大同學陳調元商借二十萬旅費時，陳即帶著二十萬元現款親自送到蔣介石的府上。

蔣終於決定對周鳳岐開刀。他先密商何應欽，將駐紮在上海的第一軍向浙江境內轉移。到九月中旬，要解決周部第二十六軍的傳說甚囂塵上。周終於猛醒，急請蔣介石的同學，時任軍政部次長、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的張群前往奉化說情。蔣則明確告知張，周鳳岐必須下臺。同時告知出路，如周能自動辭職，則對二十六軍不作遣散，軍長一職亦可由周保薦擔任。周鳳岐知事已無可挽回，乃與密友共商二十六軍軍長人選。當時周有三個方案上報南京。

第一方案，在蔣尊簋、呂公望二人中擇一擔任，理由是此二人威望高，資歷深，特別是蔣尊簋更好一些。

第二方案，由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斯烈遞升軍長，此方案也是周鳳岐最屬意的。

第三方案，保薦第一師師長伍文淵升任軍長，調蔣鼎文為副軍長，再調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務處長、奉化籍的陳焯為參謀長。

三套方案上報以後，何應欽表態，蔣尊簋是周鳳岐的老師，斯烈是周鳳岐的摯友加親戚，讓斯

烈當軍長等同於周鳳岐當軍長。顯然，前兩個方案否定了。何應欽傾向於第三個方案，然蔣介石有不同意見，說蔣鼎文另有安排，不宜出任二十六軍副軍長。最後確定的方案是周鳳岐辭去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六軍軍長職務；省主席由何應欽兼任，未幾由蔣伯誠全權代理；第二十六軍軍長空缺，由陳焯出任副軍長，代行軍長之職，所屬兩個師長也易人，改成趙觀濤、張驥充任。

蔣介石在奉化待了一個多月後，既安排了一些重要事宜，也以「在野」之人的視角觀看考察了一些軍政要員。靜默思動，蔣介石在家鄉似乎吸足了元氣，於是在九月二十二日離開奉化，轉杭赴滬。蔣鼎文也隨之趕到上海。

五、情定普陀山

蔣鼎文出任浙東警備司令兼寧波公安局長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除了辦了不少讓蔣介石滿意的事情之外，最大的人生收穫便是獲取了他終身的愛情之果。

在這之前，蔣鼎文曾有一樁婚姻，結婚的時間約在他赴廣州之前，即在杭從軍的一段時間，元配妻子為距盤山不遠的屠家塢村人，姓周，為周春榮的小女兒，比蔣鼎文大三歲，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出生，育有二個女兒，但周氏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病故。

另外一樁婚姻，如果從《宗譜》的記載上看，有點類似側室，即蔣鼎文承繼給當地一戶蔣姓人家，由要求承繼的人家，名義上為蔣鼎文討娶一門媳婦，為其生子，然不承擔法律責任。所娶之女為吳姓，比蔣鼎文小十歲，是江蘇常州吳志良的長女，蔣鼎文為所承繼的人家生下一子一女，兒子取名尚潔，排行風字輩。究係何種原因導致這樁婚姻已不可考，但這種有實無婚的風俗卻符合當時

習慣。

前一樁婚姻，結髮妻子已逝；後一樁婚姻純粹是為同宗增添後嗣、傳宗接代，或像「典子」行為，無法律上的義務。所以，蔣鼎文三十歲之前的婚姻似乎並非兩情相悅，即或已成為一個軍人，還得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得囿於社會習俗結婚生子，故而找一個稱心女子成了他人生的一個目標。

一次偶然的機會，終使蔣鼎文找到才貌雙全的新式女性。

蔣鼎文在寧波期間，為約束部隊紀律，也為保衛蔣介石的安全，隨時聽從調遣，他把部隊駐紮在靠近奉化溪口方向的市郊。公安局長一職事多且煩，他就把這一職務交由長期跟隨他的警衛團副團長張炯（劍吾）擔任，自己帶著副官主任朱平之到處巡防，同時與在浙的黃埔系軍官把盞敘舊，



一九二七年蔣鼎文於寧波任浙東警備司令

給他們吹風打氣，說蔣總司令一定會很快東山再起，官復原職。一九二七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天高雲淡，風平浪靜。蔣鼎文按照巡防安排，帶著副團長張炯、副官主任朱平之和其他隨員乘輪船前往舟山，普陀山也是他們這次巡防重點，因為其時的舟山亦屬浙東警備司令部管轄範圍。

普陀山位於東海偏北部，是舟山一千多個島嶼中的一個小島，像一條蒼龍漂臥海上，面積逾十三平方公里，與沈家門隔海相望，為觀世音菩薩道場，素有海天佛國、南海聖境之稱，與山西五臺山、安徽九華山、四川峨眉山並稱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上寺廟眾多，以慧濟寺、法雨寺、普濟寺最為壯觀；瀕臨海灘的千步沙、潮音洞等風景點引人入勝；山上供奉莊嚴的觀音菩薩，謂是教化眾生的道場。由於其神聖、神秘、神奇，自古以來就是旅客慕名嚮往之地，一到春秋兩季，遊客信眾紛至沓來。

那日蔣鼎文所乘輪船開出不久，蔣鼎文即與隨員在船舷觀看海面景致。剛過鄰艙，適見室門開啟，走出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來。這女子體態勻稱，衣飾入時，容貌氣質優雅有度。那姑娘見一位氣度不凡的軍官專神地盯著她，霎時臉紅，便低下頭退入客艙。跟隨這位姑娘的還有一個活潑頑皮、約六、七歲的男孩，見到一位威風凜凜的軍官在看著他們，並不覺得害怕，反而十分好奇，在那女子退入艙中後，又跑過來和蔣鼎文玩耍。蔣鼎文見那女子不但生得可愛，還在舉手投足間顯出知書達理風範，心中頓時萌動。於是讓隨行人員拿些糖果給小孩吃，詢問小孩那女子是誰，始獲知這女子是小孩的小姑姑。於是蔣鼎文便想方設法與那女子相識，知道她名叫蔡文援，上海人，她這次是隨母親攜小侄前往普陀山進香的。

到達普陀山，蔡文援與其母住宿在普濟寺的客房中。作為堂堂司令的蔣鼎文則有意地租下他們

隔壁的客房，熱心地陪著他們在寺內、山上各處遊玩，並運用他的歷史知識為他們講解。同時買了玩具零食，送給小孩，彼此很快熟識。蔣鼎文叫來副官主任朱平之，略述他對蔡文援渴慕之意，請他代為牽線。朱平之察言觀色，早知司令對蔡小姐有心，見其鄭重吩咐，滿口應允，於是尋機到蔡文援房中拜訪她的母親。朱對蔡母說：「我們司令，太太病死多年，尚未續弦，如果老太太肯將小姐與我們司令聯姻，將來前程遠大無比。」

姻緣這個東西有時還真不得不信。蔡文援系出上海名門，父親蔡文清為商界要人。蔡文援畢業於上海中西女子學院，中外兼修，容貌才識均過於常人，也許眼界過高，一時竟找不到如意郎君。這一年不知不覺間跨入了二十五歲門檻，此次隨母專程從上海赴普陀山燒香，就是為祈求美滿婚姻而來。蔡母見蔣鼎文身材魁梧，儀表堂堂，身為浙東警備司令，前呼後擁，威風凜凜，兼之蔣鼎文放下身段，處處照應他們，頗有好感。蔡母心想，如能找到一個當軍官的女婿，家庭、小女也好有個依靠照應，於是心中已然有譜。

蔡母隨之詢問女兒。蔡文援見過不少男生，總是高不成，低不就，如今與蔣鼎文幾次接觸下來，真是「郎有情，妾有意」，內心也認定這位敦實的青年軍人即是她要找之人，於是含羞向母親表示，女兒終身大事請母親定奪便是。

作為母親，何嘗不知女兒所想，但又擔心蔣鼎文見色起意，謊騙成親，如若女兒過去做小受苦，到時悔之晚矣。便對朱平之說：「如要與我們女兒訂婚，須在佛前發誓，確係前妻已故，作為正室結婚，聘禮一切要按照上海風俗進行。」朱平之聽到老太太應允，喜滋滋回到客房稟告蔣鼎文。

蔣鼎文聞言大喜過望，沒想到事情如此順利。對於蔡母所提條件滿口應允，立即派人買來紅燭，

請來蔡母，執未來女婿之禮，並在佛前盟誓。隨後又按照上海習俗，準備豐厚聘禮送致蔡母。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蔣鼎文與蔡文援在海州（今屬江蘇連雲港市）舉行結婚儀式。其時蔣鼎文任整編後的第九師師長，部隊駐紮海州。結婚儀式隆重簡樸。從此，蔡文援一直與蔣鼎文風雨同行，伴著他遍行各處，直至一同奔赴臺灣，偕老終身。

蔡文援女士確是個有膽有識的人，蔣鼎文軍事生涯跌宕起伏，特別是西安事變，蔣鼎文由陝返寧，進而又由寧入陝，蔡堅持要陪同丈夫同入虎穴，後經宋美齡、宋靄齡兩姐妹勸解，才罷同行之議。蔣鼎文給家鄉捐辦盤山小學，許多事情包括開學典禮都由蔡文援女士操持。由於蔡文援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蔣鼎文每與外國人交往應酬，均由蔡代作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蔣鼎文攜妻將雛赴歐美考察遊歷十餘月，蔡文援更是如魚得水，盡展自己的外文學識。出國歸來，又與蔣鼎文共同撰寫考察報告，遞交蔣介石作治國參考。

蔡文援相教持家，賢聲在外，多為友人所稱道。蔣鼎文病逝後，她在臺灣、美國兩地居住。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病逝於美國，但遺骨運回臺灣，與蔣鼎文合葬。

六、蔣介石親授錦囊妙計

蔣介石離開上海抵浙四十天後，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再返上海，在赴日之前，蔣介石要作一些調度安排。蔣鼎文旋即遵囑從寧波趕到上海，住在上海一品香大旅館。適逢廖仲愷先生夫人何香凝也下榻於此，於是蔣鼎文過去執師母之禮。何香凝女士告訴蔣鼎文：蔣中正先生等一下要來，你可過來一同見過。

未幾，蔣介石戴禮帽，架墨鏡，著一襲長衫，以一副紳士派頭來到一品香旅館。蔣鼎文也在那裡等候。蔣介石與何香凝略事寒暄後便說：「銘三，我向廖夫人請個安，等下，我再到你房間聊幾句。」蔣鼎文知道他們有事要談，便識趣地退回自己的房間。

蔣與何香凝談話時間並不長，就來到蔣鼎文住處。蔣介石開門見山地說：「銘三，我正要找 you，你現在的位置要動一下。」對此，蔣鼎文已有思想準備，因為此前何應欽讓他出任第二十六軍副軍長，是蔣介石不同意，並告訴蔣鼎文他另有打算。

蔣介石說：「我們商議了，讓何敬之去當浙江省的主席。但這有一個前提，即要讓出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的位置，而且我建議由你去接任第一師師長，敬之、德鄰和健生他們都是同意的。」

由蔣鼎文出任非常時期的第一師師長是蔣介石的知人善任，也是任得其所。蔣鼎文履歷完整，在組建黃埔軍校黨軍時，他任第一師前身的教導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副團長；其後又調任黃埔軍校第二師第五團團長，北伐中期又讓他組建出任總司令部直屬的傷兵團少將團長；旋又被蔣介石調至他下野棲身之處，出任浙東警備司令；在多個崗位上得到過鍛鍊，且在蔣的起家部隊中交叉任過職務。

蔣鼎文忙表示：「感謝總司令的信任，我不會辜負您的栽培。」

「我赴日本後，你到寧波去安排一下，何敬之會找你談的。你是革命多年的同志，又是第一師的老兵，你也知道黃埔精銳全在第一師，對於你的帶兵能力，我不擔心。但現在的革命環境險惡極了，你千萬要小心謹慎。對於有些所謂的命令，要開動腦筋想一想，萬不得已的時候，第一師的部隊只准向南開，不許向北邊移動調防。」

對於當時混沌的時局，錯綜複雜的態勢，蔣鼎文雖然有些明白，但絕沒有想到蔣總司令會說出

這樣直白的話來。

「現在北邊是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還有很有些戰鬥力的張宗昌。如果一師開到北邊去，一師戰鬥力固然強，但他們可能會聯合起來把我們的第一師合圍消滅。如果我們向南走，可以與陳銘樞會合，這樣力量就大了。所以你肩上的擔子是很重的，你必須保護好黃埔軍校的精華，並能夠發展壯大，我們是要東山再起的。」¹

直到此時，蔣鼎文才澈底明白蔣介石不讓他當第二十六軍副軍長的良苦用心，也在此時，蔣鼎文感到，蔣總司令又把一副千斤重擔壓在他的肩上。

末了，蔣介石又對蔣鼎文叮囑：「我去日本之後，我們隨時保持聯繫。我們之間聯繫可通過一民（朱紹良）轉達。但當聯繫不上時，你要憑自己的政治嗅覺、軍事知識，作出準確的判斷，萬不可魯莽行事。」

九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偕宋美齡及張群由上海乘「上海丸」郵輪駛往日本，蔣鼎文及其他黃埔系將領趕往碼頭送行。隨即蔣鼎文返回寧波。

未過幾日，何應欽找蔣鼎文談話，說是蔣總司令推舉他擔任第一師師長，並即刻赴任。十月下旬，國民政府正式發文，任命蔣鼎文為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蔣介石為何如此期望殷殷，拳拳囑託，蔣鼎文還是有所瞭解的。

前文已述，蔣介石未下野之前，在浙江寧紹地區安頓著十個補充團，團長幾乎都是黃埔第一期畢業生，當時有關麟徵、馮聖法、劉保定、李園等，蔣介石又令從國外購買進一批新式武器，槍械

¹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二頁。

彈藥存放在蔣鼎文浙東警備司令部所能控制的倉庫之內；同時，蔣鼎文在寧波設立招待所，接待招納寧漢分裂以後從各地、主要是武漢過來的黃埔軍校學生，對他們施以政治和軍事訓練，人數達千餘人。這批人員的給養，經蔣鼎文向浙江省政府「武力」索取以後，解了一時之急，可終不是長遠之計，相反卻引起了由李、白所操縱的南京政府的嚴重關注和反感。南京政府下令，要何應欽負責解散十個補充團和聚集在寧波的黃埔軍校學生，何遵從李、白指令，下達解散命令。蔣介石獲悉後極度憤怒，痛罵何應欽愚蠢無知，軟弱無能，誤他蓄積人才的大事，並怒斥當時黃埔同學會負責人，你們為什麼不號召補充團加以抗拒，萬不得已上山當土匪都可以，怎麼也要把力量保持下來。

這一行動，還僅僅是李、白要分散黃埔系力量的前奏曲，緊接著，李、白以中央軍委會的名義讓何應欽下令，將駐在京、滬、杭一帶由黃埔師生帶領的軍隊，主要是第二軍，一律開往江北駐防，名義是防堵孫傳芳軍隊再次渡江反攻，而所遺京、滬、杭一帶的防地則交由廣西部隊接防。蔣介石得悉此事，認為李、白這樣做是要置他的黃埔系部隊於死地，如不加以有力抵制，有被分而殲之的危險。於是蔣介石立即密電在杭州的黃埔同學會負責人曾擴情，迅速通知團長以上的黃埔同學到上海朱紹良家中開會，以便商討應對之策。

宋希濂時為黃埔同學會交通股長，曾擴情把這一秘密任務交給宋辦理，並作了交代，此事不能讓何應欽知道，也不能用電報、電話通知到會者，必須面告。宋希濂星夜在滬杭、京滬兩線上奔波忙碌，幾乎每到一個大站，宋希濂都要下去通告。

朱紹良和何應欽為日本士官學校第九期同學，並在貴州王文華部共事過，在那時，兩人就不大融洽。一九二七年，朱紹良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下野後，朱也隨之辭職，到上海

閑住。

應急會很快召開，黃埔同學到會的有胡宗南、樓景樾、黃傑、李延年、李默庵、關麟徵、馮聖法、丁炳權、陳武、王敬久等，二十多個人擠在朱紹良家會客室，滿滿一堂。會議由朱紹良主持，眾人紛紛發言，會上胡宗南發言較多，主要意思是：

一、校長的英明，在國內無出其右者，現雖暫時下野，不久的將來必然會出來收拾時局，我們軍校同學帶領的隊伍絕不能脫離他的領導。

二、李（宗仁）、白（崇禧）陰險，敬公（何應欽）忠厚，不易對付他們，容易上他們的當，補充團的撤銷使我們的力量受了很大損失。

三、李、白要我們開過江去，而把京滬杭一帶交廣西部隊接防，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不是很明顯嗎？就是要我們去和孫傳芳、張宗昌等北洋軍閥拼打，而他們卻截住我們的後路，想藉以消滅我們，至少也可扼住我們，這是很危險的。

四、江浙地區富庶，我們要向北進，必須有江浙地區物資的支援，必須要有鞏固的後方，而現在卻要由他們來控制，等於使我們沒有後方了，這是多麼危險呀！

其他人也紛紛表示，絕不能聽之任之，一味服從現在南京政府的所謂命令調遣。最後會議作出決定，拒絕李宗仁、白崇禧與何應欽的移軍江北的命令，如再強迫，各部要聯合起來應對，並採取必要的行動。¹

這次會議的成果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目的與何應欽的命令未能實現和落實，而且何應欽在黃

¹ 參見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五九—六〇頁。

埔系中的威信大大下降。意思明擺著，作為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正在崛起的黃埔系軍事力量，只能服從、聽命於蔣介石校長的領導和調遣。其他國民黨軍政領導人，包括何應欽，沒有蔣介石的旨意，是不能指揮這支部隊的。

然這種「拒絕」總是暫時的、私下的，公開抗命總是不行的。蔣介石知道李、白既有此圖，這計不成，還會醞釀出另外計策，尤其他不在位時，加強軍隊控制，特別是掌控第一師這個主力部隊的師長就顯得尤為重要，所調配人選既要有資歷，又要有戰功，還要跟李、白、何可直接對話，甚至有時還要作些策略的抗辯，而且這種抗辯又要讓對方能夠接受。

蔣鼎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受第一師師長之職的。第一師是在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第二團主幹基礎上，於一九二五年四月組建而成的。首任師長為何應欽，其後錢大鈞、王柏齡、王俊、薛岳相繼任過師長或代理師長，但任職時間均較短暫。蔣鼎文任職前的師長為鄧振銓，鄧振銓係雲南楚雄人，貴州講武堂畢業，他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份出任一師師長的，到職不久即因病告假，至八月中旬由副師長胡宗南代行師長之職。胡宗南當然是蔣介石信得過的將領，然在其時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擔任一師師長之職，無論從資歷或戰功上不足以服眾，尚需時局磨練。

對於這段史實，李宗仁的回憶可作側面印證：「唯自蔣總司令下野之後，第一軍各師均無鬥志。聞蔣臨去時，曾暗示各師「保存實力」，並將第一軍大部調往滬杭路一帶。今番寧滬吃緊，白崇禧嚴令各師赴援之時，據說滬杭路上第一軍各師、團長曾開秘密會議，討論是否服從白參謀長的命令。會中曾小有辯論，所幸其中多數人深明大義，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定服從指揮，向龍潭進兵（此實

為蔣總司令嫉妒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誰能指揮他的心腹軍隊，他就恨誰」¹。

蔣鼎文是正式命令發布前到達一師工作的，軍委會正式任命其為第一師師長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同時任命胡宗南為副師長，李鐵軍為政治部主任，第一團團長方日英、第二團團長李玉堂、第三團團長甘麗初。師長是黃埔軍校的教官，其他師團一級均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清一色的黃埔系。

鑒於部隊人員擴充，未幾，南京軍委會決定將第一軍擴編為三個軍。原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除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外，不再擔任軍長，而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總指揮；由劉峙出任第一軍軍長，顧祝同任第九軍軍長，錢大鈞任第三十二軍軍長。劉峙的第一軍除蔣鼎文的第一師外，所屬還有第二師，師長為徐庭瑤，第二十二師，師長為涂思宗。

此時第一師駐紮在杭州地區，也即為蔣介石所希望的第一師宜向南移，而不能向北邊動的地方。蔣介石為何一再告誡蔣鼎文，第一師部隊向南邊走可以與陳銘樞會合，還可保全革命力量呢？因為蔣介石對陳銘樞的信任是經過考驗的。

陳銘樞，字真如，一八八九年出生，廣東合浦人，粵中一代名將。早年在粵軍任營長、團長職時，就與蔣介石相熟，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時，任第四軍李濟深部第十師師長，與張發奎師隨大軍北伐，屢建功勳。克復武昌後，陳銘樞兼任武漢衛戍司令，所在師擴編為第十一軍，陳升為軍長。後一度遭唐生智所迫而辭職。在蔣介石的力召下，陳銘樞奔赴南京北伐軍總司令部，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三八二頁。

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一職，並主持部務，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寧漢對峙之初，武漢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裝力量就是唐生智、張發奎和陳銘樞的部隊。在武漢政權的聯共反蔣鬥爭中，唐、張兩人都服從武漢中央，唯有陳傾向蔣介石。陳銘樞曾說：「在反蔣浪潮中，我對蔣介石雖有不滿之處，但一考慮到全域和前途，我就是不願公開附和反蔣。此外，我對當時中共領導下的工農運動也認為越軌過火。」

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陳銘樞也隨之辭職出洋。陳銘樞的基本部隊第十師雖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但不久即由蔡廷鍇率領脫離起義部隊，南下福州，重建十一軍，陳銘樞得知後即由日本回國，重掌軍隊。

無論是在粵還是寧漢分裂之際，乃至如今蔣介石下野之時，陳銘樞都與蔣介石互相律動，可謂是同氣相求。對於兩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時人也持有同樣看法，包括像陳公博這樣的高層人物，在他的《苦笑錄》中是如此記述的：「陳真如（銘樞）是蔣先生拿得穩的」人物。

蔣鼎文與陳銘樞相熟亦已多年，他們在廣東時一道參加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又在北伐之時共同攻克武昌城，擊潰吳佩孚所部，可以說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如今這兩位已是蔣介石陣線的得力大將。所以蔣介石囑蔣鼎文在部隊遇到危險時要向南邊的陳銘樞靠攏，既有歷史和現實的考慮，也知道「陳蔣」二人是能夠患難與共、共謀應付複雜局面的。

七、甫任師長立奇功

蔣介石下野後，寧漢合流有了現實基礎。國民黨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派商議後決定成

立「特別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的最高執行機關，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由「特委會」決議，合併改組寧漢雙方的國民政府，選出國府委員四十六人，其中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汪兆銘等為常務委員，譚代理主席。軍事委員會也隨之改組，蔣中正、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何應欽、程潛、朱培德等當選。

原想乘蔣介石下野而操控中央大權的汪精衛，因不滿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把持特委會和軍事委員會，竟自南京重返武漢，單獨組織武漢政治分會，汪精衛依恃唐生智龐大的武裝與南京對抗。唐生智公開通電反對南京政府和特別委員會，附和汪精衛，張發奎亦率第二方面軍在廣州回應，一時寧漢對立再度形成。

鑒於唐生智擁據兩湖、安徽三省，已然坐大，且其劍鋒直指南京。南京政府乃於十月中旬密令軍委會組織西征軍，討伐唐生智部，由李宗仁任西征軍總指揮。唐生智則與孫傳芳密謀勾結，以圖一路自東、一路自北攻取南京，得手後分享江山。

為此南京政府決定在西征唐生智的同時，亦一併北伐孫傳芳、張宗昌，雙管齊下，畢竟其功。何應欽被任命為第一路軍總指揮，為北伐軍主力。

其時孫、張所部把持淮河兩岸、徐蚌一線，聞唐生智部已經行動，即調兵遣將，做好攻擊南京軍事準備。總指揮檄調各部，同時命令蔣鼎文的第一師，於十一月三日從杭開拔，移駐南京，飲馬長江。由於蔣介石赴日本之前告誡蔣鼎文，部隊往北移動需與他聯繫。蔣鼎文在接到命令後，急忙請在上海的朱紹良向蔣介石轉報，經蔣介石同意後，蔣鼎文的一師才移防南京，師部設在南京白下路的安徽中學內，主要職責是守衛南京。

孫傳芳和張宗昌軍部署於鳳陽、臨淮一線。孫傳芳是山東泰安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是北洋軍閥中一員驍勇善戰的大將。先前其主力部隊經國民革命軍的打擊倉皇北退，然很快與奉系張作霖有了聯合。張作霖特許他招兵買馬擴充實力，並在鳳陽、蚌埠、徐州一線與張宗昌軍聯手，共同對抗北伐軍。張宗昌也是山東人，人稱「三多將軍」意即不知自己部隊有多少兵，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自己口袋裡有多少錢。張宗昌長期盤踞山東，又處處巴結張作霖，同時與孫傳芳結拜為兄弟。孫、張久經戰陣，為亂世梟雄，再加奉系供應不少鐵甲車和重武器，原本不弱的戰鬥力又有了提升。

當時第一路軍除蔣鼎文第一師、徐庭瑤第二師、涂思宗第二十二師外，還有衛立煌第十四師、陳繼承師以及新編入的夏斗寅第十三師、賀耀祖第四十軍等。

當何應欽的總指揮部推進到安徽明光之後，參戰大軍幾乎都調到前線了。一時之間在鳳陽、臨淮線，第一路軍和孫、張所部擺開了決一死戰之陣勢。

未幾，何應欽命第一師再北移至滁縣。滁縣與南京相距四十多公里，與南京僅一江之隔。蔣鼎文自思這與戍守南京幾無二致，就沒有再向蔣介石報告。

滁縣（今滁州）為歷史勝跡之地，城的西邊為摩陀嶺，山勢險峻，林深幽密，相傳東晉琅琊王避難於此改名「琅琊山」。唐宋文人韋應物、歐陽修、曾鞏、蘇軾等都曾來此遊玩。山上的醉翁亭名聞遐邇，據說當時琅琊王持智仙和尚專門為歐陽修建造。歐陽修在朝為官，因得罪權貴被貶至滁縣，智仙特為他建造了這個亭子。歐陽修常到此飲酒賦詩，澆散胸中塊壘，並自號「醉翁」，一次酒後走筆，自此留下了傳世名篇《醉翁亭記》。

蔣鼎文輾轉於中國南方各地，亦遊覽過粵、桂、閩、浙不少名勝，但一直未履足長江以北。此

次不期然來到滁縣，歐陽修《醉翁亭記》頓時浮現腦海。部隊一安頓，蔣鼎文便叫上胡宗南和師部參謀們上得琅琊山來。胡宗南是教師出身，蔣鼎文古文根底也深，兩人交談契合，儘管年齡僅相差一歲，但因資歷關係，胡宗南還是口口聲聲以老師相稱。

醉翁亭周圍臺榭古樸，別有情趣，亭東一臥石橫陳，上刻「醉翁亭」三字；亭西有古梅一株，老態龍鍾，傳說為歐陽修手植；亭前小溪清澈見底，悠悠然不倦流出。蔣、胡兩人戎馬倥傯，難得清閒。如今忙裡抽暇，見山間清風，江上碧波，聲濤排鋪，滿目光豔，如此秀色，足以蕩滌心智。兩人在心曠神怡間，不知不覺來到了琅琊寺，一邊察看古人所留手跡，一邊與住持品茗縱談今昔。正當興致高漲之時，傳令兵突然送來急電，蔣、胡兩人相視苦笑，不說自明，急忙調頭下山去了。

原來何應欽發來急電，限第一師時從滁縣開拔，速速趕往明光。軍令如山，不能拖延。這道命令使蔣鼎文繞室彷徨，如師次明光，又從滁縣向北推進了一百多華里，也就是與孫、張強敵又靠近了一步。如再將這一移防信息由上海朱紹良處中轉蔣介石請示，已緩急難濟。蔣鼎文感到只能由「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來自解了，乃不敢抗何應欽之軍令，連夜率部趕到明光。

何應欽見到蔣鼎文後，急忙向他介紹戰場態勢，此次第一路軍攻擊孫、張聯軍，以顧祝同的第九軍、賀耀祖的第四十軍及夏斗寅的第十三師為左翼。左翼部隊為這次作戰主力，經過幾天激戰，竟為孫、張部隊所敗，一路撤退，現已撤至鳳陽縣東南九十里之紅心鋪一線，在苦苦支撐；徐庭瑤所率第一軍第二師為右翼，當時在臨淮關有第二師李延年、陳琪兩個團在阻擊，苦守關隘而不退卻。然若左翼再退，則李、陳兩團就成孤軍，面臨被圍殲的危險。如此鳳陽一失，則孫、張軍將餓虎撲食，直逼南京，整個戰局將急轉直下，形勢岌岌可危。

何應欽將戰況介紹完畢後，即對蔣鼎文說：「銘三兄，現在戰局非常危急，你必須率第一師快速支援鳳陽。」

蔣鼎文聽罷此語，默然有頃，心中矛盾交織。論眼下戰況，何應欽尚未講完，他就知道事情的嚴重。如率第一師傾巢出擊，則完全違背了蔣介石對他的反覆叮嚀。現在，強大的顧祝同軍和夏、賀之部都被孫、張聯軍打敗，第一師在如此的情況下迎難北擊、孤師突進，等於與強敵一決雌雄。如果戰敗，個人榮譽自不待說，更重要的是黃埔精銳灰飛煙滅，東山再起的資本也無從談起。當蔣總司令回來後，我將以何面目去面對呢？

不過，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沒有自行選擇戰場的權利。

平時，蔣鼎文是個急性子，何應欽則和緩而穩重，今天，兩人的表現完全倒轉。何應欽急於要蔣鼎文表態，可蔣鼎文還是作沉思狀。何應欽見蔣鼎文這個向來爽快直率的人如此猶豫，誤以為他怯敵所致，決定要用「重錘」敲敲這面「響鼓」。

「銘三兄，你猶豫什麼？革命軍可是有連坐法的。」

何應欽哪裡知道此時蔣鼎文心中的矛盾和苦楚，蔣介石密授的機宜可是瞞著何應欽的。對此，即或連政治嗅覺靈敏的胡宗南也僅僅看出些端倪，終因事涉機密不敢多問。如果把蔣總司令的話和盤端給何應欽，無疑使何應欽難堪。把難題拋給對方向來不符合蔣鼎文的風格，他決定獨自承擔責任和後果。

「總指揮，我立即執行命令，率部直奔鳳陽。」蔣鼎文恢復了往日的果斷。
何應欽眉頭舒展。

是晚晴空如洗，繁星滿天，蔣鼎文在淮南丘陵上銜枚疾走，心中的波瀾如淮河翻滾，奔騰反轉，久久難以平息。此情此景，亦可算得上壯士扼腕出漢關了。

有一點蔣鼎文非常明白，這仗只許勝不許敗，勝則尚可在總司令面前交待，敗則後果不可設想。所以，他在馬背上就開始籌畫此仗的戰術安排，針對張宗昌軍此時正驕傲狂妄、目空一切，他決定採用兵法上「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作戰原則，以麻痹敵方，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他與副師長胡宗南交換了看法，胡表示完全贊同蔣的戰術安排。

第一師的師部設在鳳陽縣城南門外的禪燈寺，蔣鼎文先以密集的炮火猛烈攻擊鳳陽縣城，佯使敵軍錯覺要奪回鳳陽縣城。待攻擊一陣後，蔣鼎文即把兵力梯次抽調，向左翼延伸至鑽石山、長淮圍一線；同時在右翼上又留下少數兵力佯攻，迷惑敵人。張宗昌部以為第一師的主攻方向在正面和左翼，完全不注意其他方向，殊不知，蔣鼎文虛晃一槍，親率三個主力團，以急行軍的速度直撲三十餘里外的蚌埠。這一長途奔襲完全出乎敵人的意料，故而張宗昌部完全來不及調兵阻擋，未作過多抵抗，蚌埠城就被第一師輕易地奪取。張宗昌軍的兩個師長正在澡堂洗澡搓背，放鬆身心，沒有來得及反應就赤身裸體被俘獲，其狼狽之狀傳為笑談。

蚌埠是敵軍的司令部所在，蚌埠既下，津浦線被攔腰截斷，張宗昌軍如進，則前有阻擊；如退，則早無後方，那些只能在鐵道上行駛的鐵甲車此時已無歸路，昔日的重武器成了無路可逃、無計可施的「甲殼蟲」，於是只得繳械投降，鳳陽城頓時解圍，全被蔣鼎文部佔領。驕狂不可一世的張宗昌軍四散逃竄，不少人都做了俘虜。除了俘虜以外，還有一個極大的收穫是孫、張兩軍囤積在淮南的槍械彈藥輜重全部被繳獲，從而使第一路軍的武器給養又得到補充增強。

剛任師長即打勝仗，且是在友軍失利、戰局不利的情況下扭轉危局，反敗為勝，又是人財雙勝，蔣鼎文自然樂不可支，但卻不露聲色。何應欽高興異常，馬上賞罰分明。

何應欽趕到蚌埠，對蔣鼎文說：「銘三兄，你可為黨國立下了大功。」蔣鼎文連忙表示這是總司令指揮有方，全軍將士合力用命所致。何所不知的是，直至此時，蔣鼎文還在琢磨如何向蔣介石匯報這場戰鬥呢。

何應欽告訴他，此次戰鬥，顧祝同所指揮的部隊有失誤，決定給予顧軍長記大過處分；第二十二師師長涂思宗作戰不力，按軍法予以撤職處分。同時為嘉獎第一師的功勳，第二十二師師長的出缺由蔣鼎文師長推薦人選，報軍委批准即可。

蔣鼎文思前想後，決定推薦胡宗南去出任。對於胡宗南，蔣鼎文評價很高，認為他能夠吃苦耐勞，又有軍政才幹，是一個人才。蔣鼎文找胡宗南談話時，胡宗南開始還有點不情願，說不願離開老師，在老師的領導下征戰，能得到更多的教誨，自己的成長會快一點。蔣鼎文當然知道，胡宗南一方面說的是真心話，一方面也在顧忌第二十二師這個剛從北伐收編過來的部隊，其軍紀軍風和戰鬥力與精銳的第一師不可同日而語。

蔣鼎文對胡宗南說：「宗南啊！你的眼光應放得遠一些，你留在我身邊，固然可為我減輕壓力，我何嘗不這樣想，但我要考慮你的前途。你要單飛到艱苦環境中去鍛鍊，把一支無甚戰鬥力的部隊帶到強盛，才顯示出你的本事來。」

胡宗南默默點頭。

蔣鼎文又說：「為幫助你儘快開展工作，你從我們一師中帶兩個團長過去。」

胡宗南感激莫名，他知道軍中最難求的是戰將，兵可以找，將則須練。老師對他的關心提攜真是不遺餘力。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胡宗南正式出任第二十二師師長，蔣鼎文把原第一師政治部主任李鐵軍，第一團副團長梁華盛配置到胡宗南師當兩個團的團長。頓時，胡宗南在第二十二師的工作理清頭緒，迅速展開。

國民黨軍隊的建制，旅、縱隊、軍團、集團軍、方面軍、某路軍等名稱變化頻繁，因時而設，但「師」一級建制非常穩固，師是軍中的戰略單位，具有獨立的人事、裝備、補給系統，在軍中的「地位」非常之高，凡是能幹的戰將都是在正師長一級崗位上，打出戰績後再提拔上去。

蔣鼎文這一舉薦為胡宗南的軍政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胡宗南調至二十二師以後，蔣鼎文對第一師的配置也作了相應調整，組成如下：師長蔣鼎文，副師長甘麗初，參謀長蕭恢權，政治部主任吳斌，第一團團長陳沛，第二團團長李玉堂，第三團團長李就（後改名李楚瀛）。其中陳沛是從師部參謀處長調至主力一團任團長的。又是清一色的黃埔師生。

蔣鼎文所提拔的這批人大多成為國民黨的得力戰將，其後幾乎都為中將、上將，官至兵團司令和方面軍司令。他們多年後還是慨歎：「老師對他們真是知遇之隆。」¹

蚌埠一下，攻克徐州就提上議事日程。此時何應欽的第一路軍又與西線的馮玉祥軍約定，兩軍合力會攻徐州。

徐州古稱彭城，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中原核心之樞紐。鐵路開通後，徐州成了津浦鐵路和隴

1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九八頁。

海鐵路交會處，更增加了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孫傳芳、張宗昌長期浸淫於此，此番蚌埠慘敗，更使他們意識到徐州是他們唯一可以憑藉之雄關了。因而兩軍聯合防守，守軍達七萬餘人，由張宗昌坐鎮親自指揮，以抗擊北伐軍進攻。

攻取蚌埠後，何應欽的第一路軍稍事休整，即圖北取徐州之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蔣鼎文第一師準備向徐州市南郊挺進，新任二十二師師長胡宗南部也會同前往，顧祝同、賀耀祖、夏斗寅、衛立煌部等都漸次開拔。

何應欽總部仍駐明光，在那裡作緊鑼密鼓的攻城部署和兵力調配。

一樁偶然獲得的情報改變了戰役部署，也澈底打破了孫、張原準備偷襲北伐軍的計畫，形勢發展之快連何應欽、蔣鼎文他們都沒有想到。而這個「偶然」發現，正是由蔣鼎文的好友，也是他的小同鄉何競武所致。

何競武，浙江諸暨楓橋花明泉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畢業，與蔣鼎文同齡。個子高大，說話豪氣干雲，許多人以為他是北方人士。北伐初期，即在何應欽東路軍總司令部作戰處任作戰參謀。徐州大戰前三天，何競武與同事們在麻將圍城，時近半夜，何競武內急，到室外曠地小便，忽聽見路旁一根電線發出「嗡嗡」的聲音，他上前一看，並用手觸碰了一下，竟是一根電話線，職業的敏感使他感到其中有文章，於是他馬上拿來電話機，搭上電話線竊聽起來。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原來他聽到的正是張宗昌在對他手下重要將領徐源泉、張學成下達命令，部署對北伐軍圍而殲之的計畫。

作為作戰參謀，何競武當然瞭解何應欽的大致作戰佈置。於是他不顧夜深，直奔何應欽寓所，

向他緊急彙報軍情。何應欽聽完彙報後，迅速召集劉峙、顧祝同、蔣鼎文、賀耀祖、衛立煌等高級將領會商，何競武列席彙報。隨之，第一路軍根據所竊聽到的情報調整作戰計畫，並將調整情況通報馮玉祥部。

原來張宗昌的作戰計畫比北伐軍原所定進攻的時日要早一天；而且預定攻擊的正是北伐軍相對薄弱的部隊，即集中兵力先消滅鐵路正面北伐軍的四十軍賀耀祖所部，再圍殲第一軍主力。如果不是何競武這一意外的發現，北伐軍極有可能陷入被動，而且極有可能要吃敗仗。得到這一情報後，第一路軍相應作出針對性的調整，主力不再直上徐州，反而提早轉向南宿州，速以大部隊包圍敵人，一舉擊潰張宗昌的精銳，打了一場出奇制勝的大勝仗。

軍情通報會上，蔣鼎文與何競武作了眼神交流，蔣向何伸出大拇指，兩個小老鄉都會心地笑了。

由於何競武隨時保持軍人的警惕，在偶然之中抓住了轉危為安的機會，戰後，何應欽論功行賞，提升何競武為中校，並給予獎勵。當年何競武的同事劉健群對此有生動的回憶：「何競武之所以能夠破例升一級，當然不是小事。」因為何應欽對於軍階的控制嚴格且持重，「大家常常私下竊竊議論，何將軍對於部下的升獎，不是用大秤來稱，而是用小天平過量，差一絲一厘都不行」。¹

當時的第一軍軍長劉峙對何競武也大大讚揚：「總指揮部參議何競武，係浙江人，他久居北方，熟悉北洋軍閥情形，且賦性機敏，善於竊聽敵人電話，搜集敵情，我軍所以能制敵機先，則賴何參議用智得法。」²

1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劉健群：《銀河憶往》，第五三頁，臺北《傳記文學叢刊》。

2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書館一九六六年版，第六一頁。

何競武由此官運亨通，其後晉見蔣介石，兩人交談投機，何後來升為中將，官至平漢鐵路運輸司令、隴海鐵路管理局長、交通部次長等職。

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下，何應欽的第一路軍和馮玉祥部聯合發力，很快於十二月十六日攻下徐州。徐州一下，黃河以南基本成了北伐軍的天下。蔣鼎文的第一師駐紮在東賀村，又乘勝沿津浦線追擊張宗昌的殘部至運河以東，進而再戰，把敵追至山東滕縣、滕安等地。從此，國民革命軍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取得了主動。

八、「二蔣」密談火車上

徐州攻克半個月之前，也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婚禮；而徐州攻克後的第四天，也即十二月二十日，何應欽的第一路軍眾多將領，連同西北馮玉祥軍的鹿鍾麟、韓復榘、石友三、龐炳勳等聯名發出一封擁戴蔣介石復職的電報。

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離開上海到達南京，並於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恢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稍後，蔣介石將第一路軍改編為第一集團軍，蔣兼任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四個軍團，一、二、三、四軍團的總指揮分別由劉峙、陳調元、賀耀組、方振武擔任。

劉峙的第一軍團下轄第一軍、第四軍、第九軍，蔣鼎文出任第一軍副軍長，兼代軍長一職（軍長名義上由劉峙兼任），同時仍兼任第一師師長，第一軍下面還有徐庭瑤的第二師，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師。各師駐紮在徐州周圍，蔣鼎文駐軍東賀村。

蔣介石復職後，對北伐部隊的具體情況自是要作更多的瞭解。同時蔣對五個多月前何應欽呼應

桂系逼「宮」、推波助瀾、迫使自己不得不下野亦耿耿於懷，今趁大權重掌之時欲對何應欽有所反應，以一雪前恥。二月上旬，蔣介石打電話給蔣鼎文，讓他從徐州趕到南京來彙報，蔣鼎文乃從津浦線乘火車抵達南京。

「二蔣」之間，自上年九月上海一別後已有五個多月未曾謀面，他們之間交流多是電報電話聯繫，或是朱紹良中轉，如今直接碰面，兩人顯得親近異常。

蔣介石說：「銘三，我想聽聽你擔任一師師長以後的工作情況。」

蔣鼎文於是把衛戍南京，開拔滁州，夜奔明光，轉戰鳳陽，奇襲蚌埠，攻克徐州等戰役的經過和自己當時的想法都一一向蔣總司令作了詳細彙報。

蔣介石雖久經戰陣，然對他的得意屬下秉承他的旨意所直接指揮取得的戰役勝利，還是聽得津津有味。

蔣介石又問：「現在徐州雖然攻下，但孫傳芳、張宗昌所部依然在周圍虎視眈眈，力量依然不可小覷，你的部隊能夠守住嗎？」

蔣鼎文連忙說：「總司令，徐州防衛絕無問題。如果您去視察，我將隨身做好防衛。」

蔣介石說：「是的，我想去看一看，就明天，你與我一道去。」

二月九日，蔣鼎文陪同蔣介石，乘專車由南京北上徐州。

經過這段時間的浮浮沉沉，在蔣介石看來，事實上也是對跟隨他的高級將領的一次很好的、全面的考察。在這起起伏伏期間，有些人模稜兩可，有些人曖昧不清，有些人暗中使壞，有些人隨波逐流。而蔣鼎文則逆勢而上，對他的忠誠、擁戴、執行旨意，比平時還堅決，特別是對他赴日前的

軍機囑託，蔣鼎文牢記在心，既時彙報，又審時度勢，不但沒有辜負他的託付，而且做出的事情、取得的成績比他設想的還要滿意。

在赴徐州的火車專列上，「二蔣」又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

蔣鼎文是這樣回憶的：

於是隨他（蔣介石）的專車北上，在車上他告訴我：「這一次到徐州，非找何應欽算帳不可，他從福建起到今天已用去一千多萬元，這樣大的數目是怎樣花掉的？」到了徐州，何應欽的總司令便被撤查，蔣何之間，因為下野之事難免有芥蒂。傳說有好幾次委員長要殺何應欽，不知真假，不過有一幕卻是我親眼所見。我有一次到南京去見委員長，恰巧何應欽的太太也在座，我親耳聽何太太向委員長說：「你對何敬之要像兒子一般看待，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千萬不要生他的氣，把氣悶在心上。」這可以想見兩人的關係，以後何應欽雖然仍居高位，可是實際的權柄卻不能夠操持，這是一件無庸置辯的事實。¹

蔣介石這次突然北上徐州，事先並沒有告訴何應欽，這使何極為尷尬。時任交通部次長並準備復職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書記長的李仲公有一段回憶，其時何應欽對李說：「老蔣對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調我為總司令部參謀長，把我的面子丟盡。不管怎樣，我決不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五頁。

就，聽候他發落好了！」李仲公耐心地開導何應欽：「不用急，我看不要緊，即使他對你有些疑心，你同他畢竟有一段深厚的歷史，而他又是一個重感情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交通部長）到徐州去，待向他作一番解釋，想來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不過，他的脾氣你知道，愛之加膝，惡之墜淵，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你要同他鬥，是鬥不贏他的。還有他對你猜忌最不放心的的是你與桂系的關係，你對此事往後須要善處。」¹何應欽無可奈何地對天長歎，答應就任參謀長一職。

二月十三日，何應欽向蔣介石發出辭去第一路軍總指揮的電文。蔣介石接受了何應欽的辭職，並任命何為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同時讓何應欽養病休假兩個月。

蔣介石到達徐州後，在蔣鼎文的陪同下視察了徐州前線軍事佈防情況，隨之電邀馮玉祥、閻錫山等到徐州召開軍事會議，馮、閻反應並不熱烈，僅派代表參與會議，蔣介石在徐州舉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又在徐州部署北伐軍事，準備向張宗昌、孫傳芳部發動全面攻擊。

至四月十日，第一集團軍各部向山東南部的張、孫直魯軍發動總攻擊，第一軍蔣鼎文位於台兒莊、韓城一線，向北邊的棗莊、臨城、州之敵人攻擊前進。蔣鼎文在部署好第二師、第二十二師作戰計畫的同時，自己親率第一師佔領義橋，後攻下臨城。其時張宗昌一部突由豐沛進逼徐州附近之九里山，大有威脅徐州總部之勢。蔣鼎文趕忙率第一師從臨城急速返抵九里山，與友軍一起圍殲這股偷襲的敵軍，從而使得徐州總部解危。其後蔣鼎文揮師北上，會同第一軍徐庭瑤師、胡宗南師，連克滕縣、鄒縣、州、大汶口，並把泰安守軍圍而殲之，泰安守城一個旅向第一師繳械投降。而四

1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應欽》，《中華文史資料庫》第十卷，第一二〇七頁。

月十九日山東西部巨野一戰，全殲孫傳芳殘部。繼之，第一軍各師會同顧祝同所部，對山東首府濟南城發起最後攻擊，並在五月一日攻佔濟南城，殲滅和俘獲張宗昌殘部。

攻佔濟南次日，日軍藉故向北伐軍武裝挑釁，肆意血腥屠殺中國軍民，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進而又以令人髮指的手段槍殺中國政府交涉人員蔡公時。蔡公時，江西九江人。一九二八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攻克濟南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山東交涉員。日軍全副武裝到山東交涉公署尋事，並以暴力手段捆綁交涉署辦事人員，蔡公時據理痛斥，惱羞成怒的日本軍人竟將蔡公時等十七人肆意凌辱槍殺。赴任僅一天，蔡就壯烈捐軀。

日軍為什麼不顧國際公法，如此喪心病狂，肆無忌憚，蔣鼎文是這樣觀察的：我第一軍在「五月初會同方振武部隊攻下濟南，自從徐州克復以後，革命軍揮師北上，勢如破竹，所向無敵，眼見就要統一中國，此時卻發生了濟南的『五三慘案』，北伐軍事遭受了日本軍隊的正面阻撓。原來歐戰以後，日本已取代德國，獲取了山東半島的權益，對於膠濟鐵路的利益呈獨占之勢。國民革命軍的目標非常顯著，即內鏟軍閥、外抗強權，軍事行動進展到了山東，與日本利益發生了衝突；同時，日本眼見革命軍就要統一中國，中國富強可待，則日本侵略中國之夢難以實現，所以出兵阻撓。日本支持北洋殘餘捲土重來，使中國陷於分裂，日本侵華計畫便能實現。這是日本製造『五三』濟南慘案的動機。」¹

賀耀祖的第四十軍等部血脈賁張，乃奮起反擊，與日軍展開激戰，日軍派出飛機轟炸，力圖擴大戰事。蔣介石作為中國軍隊的總司令當然義憤填膺，但他認為此時同日本交戰尚不是時候，急速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六頁。

下令攻佔濟南的部隊須約束情緒，不許外出，力避與日軍武裝衝突。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成。慎之！勉之！」看來強壓情緒，審時度勢，「攘外必先安內」統一中國之宗旨，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蔣介石心中就深深地紮下了根。

為了北伐的大局，蔣介石僅留李延年部守護濟南，其餘部隊繞過濟南，改道北上。同時蔣介石又給各部發出密電：「我軍到達京、津，應避免與外兵衝突。」而蔣鼎文的第一軍也奉令撤出濟南，南下回師泰安、州駐防整訓，所部未曾北上天津、北京。

孫傳芳見大勢已去，乃於六月三日下午。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於次日遁跡關外，火車開至皇姑屯，被日軍所埋設地雷炸死。張宗昌的徐源泉部歸順國民政府軍，而稽遲於冀東的張宗昌另一殘部，蔣介石認為其無可救藥，乃命部隊進剿繳械肅清。

六月八日，北伐軍占領北京，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北伐成功。至此，歷時約兩年的北伐軍事行動宣告勝利結束。到了十二月，東北張學良宣佈易幟。

自北伐以來，不少青年從軍，加之對北洋軍的收編，使軍隊人數激增，政府和民眾不堪重負。北伐成功以後，南京國民政府首要的任務是裁撤合併軍隊，並提出了「統一軍政」、「實施訓政」的號召，要對全國軍隊進行縮編，以師為最大軍事組織單位，不設軍一級。龐大的第一軍團縮編為十三個師，這十三個師的師長及副師長依次為：

第一師師長劉峙、副師長張克瑤，第二師師長顧祝同、副師長李明揚，第三師師長錢大鈞、副師長陳繼承，第四師師長繆培南，第五師師長熊式輝，第六師師長陳焯，第七師師長王均，第八師

師長朱紹良，第九師師長蔣鼎文、副師長岳相如，第十師師長方鼎英，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副師長陳誠，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這十三個師真正屬於蔣介石嫡系的為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一師，共五個師。

原第一軍所屬第一師、第二師、第二十二師，僅保留兩個師的番號，第二十二師番號給了馮玉祥的西北軍，師長由吉鴻昌擔任。蔣鼎文的第九師為新設立編制，其原所執掌第一師的主力為新成立的第一師（其中一個團劃至整編後的第一師）主要成分，另又加入原第二十二師一部；整編後的第一師為原第二十二師大部，原第一師一個團，及張克瑤的魯軍一部。故而劉峙的新第一師雖保留原第一師的番號，但原第一師的真正精華和主力為新成立的第一師所有，這為國民黨軍史所述及，許多軍事書籍乾脆直接說明：第九師是由原第一師番號改成的。¹其後蔣鼎文的第九師乃至擴編而成的第二軍都承繼了原第一師的戰鬥作風，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參加了許多惡戰，打了許多硬仗，為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統治立下赫赫戰功。

新成立第九師下屬三個旅，組成人員為：師長蔣鼎文，副師長岳相如，第二十五旅旅長甘麗初，第二十六旅旅長李延年，第二十七旅旅長劉顯庭，部隊移駐海州（今屬江蘇連雲港市）整訓。

北伐戰事完成，中國基本統一，戰亂頻仍的中國有了難得的平靜，這暫時的平靜既是各方在緩和矛盾，也是各方在蓄積力量。

政治的平靜讓軍隊得以調整和喘息，蔣鼎文也迎來了從軍以來難得的輕鬆和安定時光。於是在海州期間，他完成了兩件人生大事。

1 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第七〇頁。

第一件是結婚成家。自

蔣鼎文與蔡文援在普陀相識定親以後，時間已過去一年有餘，蔡在上海，蔣則行蹤飄忽，居無定所，戰事打到哪裡，哪裡就是他的家。

蔡若隨軍照顧蔣，則無名分。重要的是蔣鼎文已屆三十六歲，而蔡文援亦已二十七歲。於是，在這相對安定的環境下，雙方擇定於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也即農曆戊辰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海州舉行婚禮。他們結婚雖然得到軍中同儕的祝賀，但因在軍營，婚禮簡樸為上，自是不能太過奢華隆重。

第二件事是，蔣鼎文自營長、團長到此時的師長，擔負的責任越來越大，所碰到的戰事也越來越複雜，然環顧同僚，蔣鼎文還沒有找到一位精明幹練的參謀長人才，由此他益發懷念起浙江講武學堂時的老師李家鼎來。

李家鼎，字筱和，一八八九年出生，山東濟寧人，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三期，後在浙江講武學堂任教官。蔣鼎文是他任教第二年入校的學生，蔣鼎文十分服膺他的教學，李也非常欣賞蔣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蔣鼎文與蔡文援結婚於海州

軍事才幹。其後李在浙軍第二師任副團長，又應吳佩孚之邀，出任北洋軍高級參議。

蔣鼎文是如何找到李家鼐的呢？他回憶敘述道：

我進陸軍學堂時，他教我們軍事學、築城教範，諄諄善誘，學識品德都值得我們欽佩。原來他是江北速成學堂出身，在他那個時代北方有兩個著名速成學堂，一是江北速成，一是保定速成，兩個速成學堂的功課完全一樣。從來保定出的人材較多，在北洋中占了優勢，保定速成因而比較著名，江北速成反而不大為人所注意了。在陸軍學堂的教學期中，李筱和師對我的啟發和薰陶最多。我離浙江南下護法，歷經廣州多少次變亂，行蹤在粵、閩、浙諸省，很少安定。筱師由於出身關係，北上投吳佩孚，就這樣我與筱師斷了連絡。北伐軍底定長江流域，我由營團長漸漸的當了方面之任，深覺在同僚中精幹的人材，能夠助我立功立業者實在太少，客觀的條件使我需要一位具有韜略的長者替我在帷幄中分憂分勞，使我不期然的想到李筱和師。我派專人回杭州查訪，蹤訊都杳，茫茫人海從哪裡去探尋他的行止呢？於是，我想到了報上的尋人廣告，我在上海的大報像《申報》、《新聞報》等大登廣告找尋李筱和師。果然，他在北京看到了報紙，時我已駐防海州，我們取得連絡，他由北京經青島來海州相聚，十餘年不見，他儀采如昔，我遂請他擔任參謀長。¹

師生二人分別多年相聚，自是多有感慨。李家鼐所沒有想到的是昔日的愛徒竟用這種方式召喚

他，請他繼續幫助他。此後李一直擔任蔣鼎文所部參謀長，並隨蔣的政治軍事生涯升遷沉浮，山東、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福建、陝西，再河南，以後輾轉到了香港、臺灣等地。李先後任第九師參謀長、第二軍參謀長、福建綏靖公署參謀長、西安行營總參議、陝西省政府高級參議、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等職。一九三六年十月授予中將軍銜。

後來蔣鼎文辭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職，李也隨之辭職，並於抗戰勝利後閒居杭州。其後李赴港臺，並歷任「國民大會代表」直至上世紀六〇年代離世。

蔣鼎文認為，李筱和是一個難得的參謀長人才，在幕僚性乃至決策性工作方面，對他幫助非常大，是一個具有韜略的長者，但因國民黨軍內互相傾軋厲害，有些要員特別是陳誠，為了打擊蔣鼎文，



一九三〇年與夫人合影於漢口

借特務之口說蔣的參謀長李家鼎「吸食鴉片」。原來李身材瘦小，面色黝黑，這樣的體格似乎符合「吸毒」特徵，而當時軍隊中吸食大煙是非常忌諱乃至是違法的，這一「風波」甚至告到蔣介石這裡。李為免蔣鼎文受這「莫須有」罪名牽連，一度辭去軍職，到湖北襄樊出任專員。

國民黨軍敗退後，李跑到香港居住，其後又應蔣鼎文一再邀請，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偕夫人到臺灣長安路蔣鼎文寓所，與蔣鼎文共住兩年。最後李以身體多病為由堅持回港。蔣鼎文與李筱和的公誼私交終老方止，一時在港臺傳為美談，雷嘯岑還寫有《蔣銘三道義可風》的文章，推崇蔣鼎文為人處世不隨地位變化而變化，始終不脫尊師本色。

九、兩次主動讓權位

隨著北伐戰事的結束，南北各派暫告統一。由於此前戰事的區域發展，第一、二、三、四集團軍自然地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人數龐雜。這使得積貧積弱的中國無法負擔浩大的軍費開支。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認為首當其衝須裁撤軍隊，當然在裁撤過程中，蔣也希冀依照合法的程式，遣散、削弱各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實力。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個個是一世雄傑，對蔣介石葫蘆裡所賣之藥大致都能看清，因而各使手段，或消極對抗，或割據自雄，或合縱連橫，或盤踞一方，虛與委蛇，以各種方式與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周旋。

蔣介石採用「削藩」策略的編遣會議，以達消除各派實力的目的基本未成。為此，他積極策劃施用武力來消滅異己的力量。蔣介石當時心目中的第一號勁敵是馮玉祥，但馮玉祥的西北軍實力較強，割據的地盤聯成一片，集聚成體，對馮玉祥部下的收買瓦解工作又未奏效，因此一時難以下手。

至於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兵力相對較小，而且擺成了從廣東直到冀東的一字長蛇陣，力量分散，大部分部隊又是從唐生智湘軍收編而來，且對桂系軍隊內部的策反工作已見成效，加上鄂籍桂系將領胡宗鐸、陶鈞治理湖北時驕橫霸道，四面樹敵，給蔣介石以可乘之機。因此，蔣介石決定首先對桂系開刀。

原受李宗仁命令取代程潛任湖南省主席的魯滌平，因日漸親蔣，從而獲得南京政府大批軍火，這引起桂系將領夏威、胡宗鐸、陶鈞等不滿和反感，旋之魯莽地令葉琪率第五十二師、夏威率第十五師，突然襲擊長沙，武裝驅趕魯滌平。借用武漢政治分會名義，以「潛運軍械，陰謀破壞」的罪名撤免魯滌平省長之職，並由何鍵接任湖南省主席。桂系將領這種目無中央、蠻幹的舉動正中蔣介石下懷。於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派何應欽和李濟深去長沙查辦「桂軍侵湘之事」。何應欽對新聞記者說，國民政府這樣做是維護政府威信，並無武力恐嚇之意。

何應欽所說的實是「外交辭令」，也是為麻痺桂系所釋放的煙霧彈。實際上，蔣介石為對付桂系在作緊鑼密鼓的軍事準備。二月二十六日，駐紮在海州新浦（今屬連雲港）的蔣鼎文第九師以及徐州劉峙的第一師、蚌埠顧祝同第二師、兗州繆培南第四師、廬州朱紹良第八師、揚州方鼎英第十師、蕪湖曹萬順第十一師、壽州夏斗寅第十三師都接到了蔣介石的密令，要各部作好「討桂準備」，並務「於三月三日以前完畢出師準備」。¹

蔣鼎文所率第九師遵蔣介石之命，於三月初離開海州，沿途經湖口、安慶、黃岡、黃陂而到達

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七三頁。

平漢線之郝家灣駐防。

蔣介石對付桂系軍政並用，雙管齊下，在調兵遣將的同時，又秘密策反，通過楊永泰拉攏俞作柏，鼓動桂系在湖北的主要將領，也是他的表弟李明瑞倒戈。因而蔣鼎文第九師和其他各友軍未遇到過多軍事抵抗就兵臨武漢城下。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誘騙粵方李濟深到達南京。三月二十一日，巧妙將李扣留，在消除了對粵桂聯合反蔣的顧慮後，即可放手一搏。四月初，蔣介石下達對武漢桂系部隊的總攻擊命令。同時官帽、銀彈手段奏效，桂系大將李明瑞、楊騰輝陣前倒戈，致使駐鄂部隊群龍無首，未經大戰，桂系的第四集團軍便土崩瓦解。

蔣軍各部幾乎兵不血刃占領武漢。四月四日，蔣鼎文部進駐武漢。蔣介石考慮到武漢為華中樞紐、戰略要衝，桂系在此經營多年，眼下桂系雖遁跡而去，然馮玉祥西北軍對此虎視眈眈、窺視已久，蔣、馮之間免不了一場大戰，再加唐生智、張發奎又長期盤踞於此，華中地區形勢錯綜複雜，各派勢力交織，乃決定成立武漢行營，並打電報給蔣鼎文，讓蔣鼎文出任武漢行營主任，統一指揮華中地區的軍政事宜。

蔣鼎文接到升遷電令以後，並未馬上就職，反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向蔣介石作了彙報。蔣鼎文說，對於總司令的信任和器重他深感榮幸和感激，但為了華中地區的安定，也為了國民政府的統一大業，他認為由何成濬出任武漢行營主任一職更適宜一些。

蔣鼎文「禮讓舉賢」之舉是從政治軍事角度考慮，確有其道理和大局觀念。

何成濬，清末秀才，字雪竹、雪舟，生於一八八二年，湖北隨縣（今隨州）人。早年受張之洞

賞識，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在日期間，參加了同盟會。回國後，參加武昌起義，奔走於黃興和陳其美之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部副官長（總長黃興）。護法政府成立時，受孫中山指派，任駐滬特派員，擔任長江一帶聯絡工作。後又任孫中山大本營軍事委員兼粵軍許崇智部前敵總指揮。與蔣介石本人在上海灘互稱兄弟，同氣相求。北伐軍攻克武漢以後，何出任湖北省政務委員兼鄂北綏靖主任；二期北伐時任第一集團軍參謀長兼徐州行營主任，後與吳鐵成等一起赴東北，促成張學良易幟，並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何成濬不僅資歷深，且手段老辣，擅於拉攏，長於周旋，又由於長期混跡上海灘，對付三教九流深有心得，即或屬同一類型的「三雪」（另二人為陳雪暄調元，劉雪亞鎮華）中，他也是大哥級的人物。當時武漢初定，混沌不清，需要的是軍政兩方面都能搞定的人物，而蔣鼎文長於軍事，對於政治經驗，尚遜何成濬一籌，更不用說地域關係、江湖人脈了。

蔣鼎文不謀權位、主動薦賢的舉措，給蔣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於是收回成命，改由何成濬出任。

馮玉祥此前回應討桂戰役，但他以「軍事投機」者的姿態出現，表面上擁護南京中央政府討桂通電，暗中卻部署重兵於河南東部和南部，派韓復榘部進駐信陽、武勝關一帶，令石友三部駐防襄樊一帶。其意圖是坐收漁利，如蔣戰敗，即武力奪取南京；如桂系失利，則出武勝關奪取武漢。不意桂系轉瞬間失敗，對手瞬時易位，蔣、馮之間的矛盾也從蟄伏迅速轉為激化。五月十五日，馮玉祥出任討伐蔣介石的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所部五個師從河南向湖北進軍，其中韓復榘、石友三兩軍一度推進到鄂北花園一帶。而蔣介石早有防馮準備，在迅捷取得武漢以後，令各部馬不卸鞍，

人不離槍，隨時防備馮玉祥來犯。

蔣介石故伎重施，用對付桂系的手法對付馮玉祥，一方面準備開戰，一方面又玩收買馮部將領的那一套。此法依然奏效，韓復榘、石友三率部叛馮投蔣；劉鎮華、楊虎城等也紛紛通電脫離馮玉祥。眾叛親離，馮玉祥聲威大降。至五月下旬，馮玉祥被南京政府免去本兼各職，宣佈下野，蔣介石射向西北軍之箭的目的初步達到，於是暫時鬆弦。

其時的蔣鼎文已被任命為第二軍軍長，下轄范剛的第六師（稍後師長為張自忠及趙觀濤）、陳誠的第十一師和自兼師長的第九師，另有夏斗寅第十三師、楊虎城的新編第十四師、羅霖的獨立四旅和彭進之的獨立十二旅，其中羅霖之旅為原湘軍所屬，羅率兩個團脫離湘軍，從黃陂投奔中央軍，歸屬蔣鼎文指揮。蔣鼎文所率各部駐紮在武漢地區，南控湘贛，西制川鄂，北防河南，隨時準備應付各種發生的戰事。

果不然，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退據陝甘的西北軍又聯合閻錫山通電全國，列舉蔣介石之「六大罪狀」，發動聲勢浩大的反蔣戰爭，宣稱「蔣氏不亡，中國必亡」。擁戴閻錫山、馮玉祥為西北軍正副總司令，以宋哲元為前敵總司令，組成八路軍隊進攻河南、湖北。

蔣介石下令討伐，親任「討逆軍」總指揮，以方鼎英、劉峙、唐生智、韓復榘、何鍵分任「討逆軍」的指揮。蔣鼎文的第二軍和顧祝同的第一軍屬於第二路軍，總指揮為劉峙。

為迎對馮部來犯，蔣鼎文所部早在襄陽、樊城、老河口一線積極構築堅固工事，以作武漢之屏障。蔣鼎文把第九師部署在樊城，令陳誠的第十一師據守襄陽，時第十一師兵力相對較弱，成薄弱環節，於是蔣鼎文覆命第六師增援樊城守備。蓋就軍事防禦而言，若樊、襄有失，進攻武漢的西北

大門洞開，武漢極有可能不保。

與蔣鼎文部正面接觸的是當時西北軍擅打硬仗的張維璽第七軍和田金凱第五軍。張、田兩個軍出武勝關，循著白河東進，劍鋒指向襄樊；孫連仲的第八軍，劉汝明的第十二軍則從紫荊關直撲南陽。西北軍計畫這兩路軍隊聯手攻占武漢後，便與兩廣的張、桂軍聯成一線，再殺向蔣軍。

至十一月三日，西北軍與蔣鼎文部正式交戰。為避張、劉鋒芒，稍戰幾日，蔣鼎文將主力逐漸後移至襄、樊主防陣地，以逸待勞，伺機反擊。張、劉二軍見蔣鼎文軍退卻，以為得手，則攻勢愈猛，戰至十五日，西北軍對襄、樊兩個方向大肆攻擊，激戰兩晝夜後，西北軍遂呈疲乏之勢。其時，蔣鼎文所部依照原計劃，大舉反擊，張、劉兩軍力竭，便從襄、樊兩城退卻而去，從而使得西北軍進取武漢之企圖無法實現。

西北軍後勤捉襟見肘，軍事綜合實力顯然不是蔣鼎文等中央軍的對手，一時勢頭兇猛的攻勢無法持久，旋全線不支，呈潰敗之勢。

正當蔣鼎文率部回師武漢途中，突接蔣介石電，令其率部迅速南下，以平定粵亂，第二次蔣桂戰爭在不知不覺間爆發。

原來，俞作柏桂軍與粵軍張發奎聯手，成立「護黨救國軍」共同討蔣，其後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又聯絡舊部，合力會攻廣東的陳銘樞、陳濟棠所部，粵方一時全線告急，「二陳」趕忙求救於蔣介石。

蔣鼎文馬上集中各部於武漢，其中第九師李延年二十六旅已經上船，升火待發，正待轉運援粵。不期然，又發生石友三在南京浦口叛變事件。

石友三是馮玉祥部舊將，吉林長春人，本已歸附蔣介石，但一直不為蔣所信任。石與同病相憐的韓復榘、馬鴻逵互通資訊，結為同盟小集團，並與唐生智私下聯繫，擬聯合反蔣。十一月，蔣介石命在安徽的石友三率軍援粵攻桂，石友三表面上服從蔣之命令，暗地裡則把部隊帶到浦口，並扣押蔣的軍代表，同時將浦口公安局的槍械收繳。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在浦江口岸排列數十門大炮，用密集炮火轟擊南京，南京城內頓時亂成一團。石武力討蔣，並出任「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之職，在蚌埠還組成安徽省政府。在炮擊南京後沿途北撤中，石友三將南京其他駐軍全部繳械，一直退入河南商丘，與韓復榘會合，擺出一副與蔣勢不兩立的架勢。

鑒於石友三部有土匪本性，燒殺掠奪無惡不作，蔣介石命令蔣鼎文部暫停南下，首先剿滅石友三。蔣鼎文命令李延年第二十六旅登舟東下，然尚未開船，情況又發生戲劇性變化。

原來，唐生智投蔣效誠後，被蔣介石任命為圍剿西北軍第五路指揮，唐在攻打西北軍時確亦不遺餘力。先前唐生智原本與馮玉祥相約共同反蔣的，後據說唐生智投蔣的理由是閻、馮任命宋哲元為西北軍前敵總司令，這實是欺人太甚；還有一說是馮玉祥污辱唐所尊重的老師蔣百里，致使蔣、唐甚為憤怒。不管何種原因，唐生智認定不擊退西北軍就不能反蔣介石。故至十二月一日，唐率部全力攻克鄭州，致使馮玉祥西北軍再次敗北。

唐生智反蔣之心會隨時機而發酵，在汪精衛的策動之下，唐生智與石友三暗中結成反蔣小集團，同時又與南方張發奎部和桂軍遙相呼應。當石友三在浦口起事後，唐即於次日，也即十二月三日，立即聯同非中央系諸將領向全國發出反蔣通電，聲稱要與汪、閻合作，要與張發奎南北相呼應，實現其「護黨救國，促成統一」之主張。唐還在鄭州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之職，自動放

棄南京政府所給予的「討逆軍第五路軍」番號。

真是亂哄哄，你方開唱我就登場，今日還是同陣夥伴，明日就揮戈相向。面對「平粵」、「擊石」、「討唐」三個戰場的平行態勢，蔣介石對三地的討伐部署相應作了調整。

粵戰改由朱紹良第八師率所部參戰，蔣鼎文部不再參與。

「擊石」的蔣鼎文之李延年旅馬上棄舟登陸，歸入蔣之大部隊。石友三改由顧祝同第一軍去對付。「討唐」是蔣鼎文第二軍尤其是第九師的重頭之仗，唐生智在河南的鄭州、許昌一帶發難，必須認真對付唐生智數量不少、戰鬥力甚強之武裝。故蔣鼎文命令，已到廣水花園的甘麗初的二十五旅與夏斗寅的第十三師協力守豫鄂兩省交界的武勝關，防止唐生智軍南下聯接張部和桂軍，同時掩護第六、第十一師迅速東來。

對於石友三、唐生智，蔣介石雖有防備，然如此即刻返水還是始料不及。一時之間，蔣的中央軍四面楚歌，武漢之南面有張、桂聯軍進擊，東面石友三倒戈，北面唐生智調轉槍口，西北面馮玉祥軍返身而來，各路大軍虎鬚倒豎，張開血盆大口，大有將中央軍吞沒之勢。環顧中國，各路豪強，唯有閻錫山的晉軍和東北軍未投入實質性軍事行動了。

蔣介石召集胡漢民、譚延闓、朱培德、孫科、宋子文等中樞政要商討對策，會議定下基調：對於閻、張採取拉攏誘惑策略；對於石友三這樣的倒戈將軍則派員遊說，威利並舉；而對於唐生智則集中兵力殲滅。

果不然，閻錫山致電蔣介石，表示「唯中央之命是從」，為擁護中央，「錫山自當共同奮鬥」；東北軍張學良亦聲明支持中央；石友三則故伎重施，觀望不前；張桂孤軍不敢北進。蔣的中央軍於

是重拳出擊，傾力對付唐生智。

然唐生智並不是好對付的角色。唐生智，字孟藩，湖南東安人。早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科，為校長蔣百里欣賞的軍政幹才。其後回家鄉從軍，從營長、團長、旅長幹到湘軍第四師師長，旋之成為湘軍中最強大的一支地方武裝，進而取代趙恒惕成湖南代省長。北洋軍吳佩孚率部進湘時，擊敗了唐生智的湘軍，於是唐求助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先遣部隊提前入湘，頓使唐生智轉危為安，由守轉攻。唐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一職，兼北伐軍前敵總指揮。隨著北伐軍事進展迅速，唐收編了不少北洋軍和大小地方武裝，致使所部不斷壯大，第八軍迅速擴編為四個軍。「寧漢分裂」時，唐部就是汪精衛武漢政府所恃仗的武裝。蔣第一次下野後，唐生智旋遭南京政府李、白、譚、程之西征軍痛擊，唐失敗後，辭職遠赴日本。

蔣介石復職，唐生智從日本歸來，表示願服從蔣之領導。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任命唐為「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繼而蔣馮戰爭發生，唐生智率軍與西北軍開戰，討馮戰果也殊為輝煌。

如今唐突然覆手為雨，一度使蔣介石措手不及。唐部是一支能征慣戰的部隊，當時手下有馮華堂之第二軍、龔浩之第四軍、門炳嶽之第七軍、劉興之第八軍，共計十多個師，約九萬多人，尤以劉、龔兩軍戰鬥力為強。

但中央軍畢竟軍力、財力雄厚，在使出安定閭、張、穩住石友三的策略後，則對唐生智的「叛亂」展開圍剿。中央軍系的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夏斗寅、范石生、陳誠等十七位將領在武漢發表討伐唐生智的通電，大造討伐聲勢。

討伐唐生智的主力部隊是顧祝同的第一軍、蔣鼎文的第二軍、夏斗寅的第十三軍，由何應欽統

一指揮。蔣鼎文的基本部隊第九師各旅從武漢地區出發，轉道至河南信陽集結，陳誠的第十一師日夜兼程趕赴湖北隨縣（今隨州），又揮師北上至信陽；兩師在河南信陽會合後，向北抵達確山縣，在確山構築工事，以備唐軍南犯。

討唐戰事全面展開，蔣介石任命蔣鼎文為右翼軍總指揮，統一指揮第九師及趙觀濤的第六師、陳誠的第十一師、夏斗寅的第十三師進擊。蔣鼎文接到任命後，並未直接就職，他認為為了取得對唐生智戰役的澈底勝利，「右翼軍總指揮」一職以夏斗寅出任為好。¹為此，蔣鼎文向蔣介石陳述如下理由：

第一，夏斗寅與唐生智關係密切，作風相似，兩人之間的關係遠勝於與中央軍。夏雖係湖北人，但他久居湖南，人地相熟，對唐軍官兵的作戰風格相當瞭解。

第二，夏斗寅自知出身並非正統，內心自卑和狂傲交織，且時有流露。其時蔣鼎文與夏斗寅官階平級，同為軍長，如果讓蔣去指揮夏，則夏的自卑感愈濃，歸屬感削弱，對中央會日漸疏離。

第三，夏之為人患得患失，情緒反覆，迷信異常，升則菩薩保佑，敗則怨天尤人。

蔣鼎文給蔣介石的建議是讓夏斗寅來指揮他，當中央把高的職位賦予夏斗寅，且由夏這個雜牌軍司令指揮中央主力軍討伐唐生智時，夏對中央信任感自然增強，從而使他討唐更為用心和賣力。若如此，則中央軍討伐唐生智就更有勝算。蔣鼎文還認為，其時其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頻頻發生，不少部隊人心浮動，軍心不穩，在這非常時期，中央所指揮的部隊再也不能出第二個石友三了。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八頁。

對於蔣鼎文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蔣介石十分欣賞，不堅持己見，收回已發成命，改夏斗寅出任討伐唐生智部的右翼軍總指揮。

蔣鼎文何以「火線舉賢」，直言相諫？除了他的大局觀和對蔣介石的忠心耿耿以外，還有他對夏斗寅深刻的瞭解和思考。蔣鼎文是如此回憶的：

在武漢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與夏斗寅在一起，我和夏的私交因此也非常良好，他對我也不甚避諱，我就曾親眼看到夏斗寅用骨牌卜卦，問問休咎，究竟是靠蔣還是靠唐？到底還是靠蔣了，是不是因為委員長給他右翼軍總指揮，把龐大的指揮權賦予了他，而使他感激知遇因而效忠，還是另有原因呢？我想，使夏斗寅感到中央措施滿意而不靠唐，恐怕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以我指揮夏斗寅，我們本來是平行的卻去指揮他，使他感到中央待他不過如此，討唐的軍事可能更加困難了。¹

蔣鼎文對夏斗寅的觀察不可謂不精準。

夏斗寅，字靈炳，湖北麻城人，出生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夏生下不久，父親突然病故，至十三歲時，母親又離世。因而夏背井離鄉，浪跡天涯。夏讀書雖然不多，但有擅於活動、擅於逢迎的本事，他先後結識了湖北有名望的蔣作賓、李書城等人，隨後在湖北陸軍從軍，官至團長一職。湖北軍為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八頁。

吳佩孚所敗後，夏逃到長沙，投靠趙恆惕，並為趙所信任，竟將夏所帶殘部在湘境內改為「湖北自治軍」。

北伐初起，政治嗅覺靈敏的夏斗寅將所部歸入北伐大軍，被國民政府新編為第十軍，夏任軍長，稍後又出任十三軍軍長兼武漢警備司令。曾與夏斗寅共事過的鄭洞國這樣描述夏斗寅：「夏氏生得粗壯肥胖，貌似一粗莽大漢，內中卻頗有心計。」¹

夏斗寅與唐生智、陳濟棠一樣也極度迷信。傳說他早年被湖北督軍王占元打敗逃跑途中，不經意間撿到一隻裝滿鈔票的皮箱，他以為這是上天在冥冥中幫助他東山再起，於是又返家鄉招兵買馬，組成自己的武裝。當他後來謀得湖北省主席一職後，帶著星相人士在就位之初踏看省府署風水。這位星相人士告訴他：「此地風水已過，前途生發之氣太少，與主官頗為不利，故宜重選省府地址。」夏深信不疑，又讓這位方士在武漢城到處轉悠，後在胭脂山巡警道衙門，覓得與夏生辰八字相合的風水旺盛之地，夏乃按照方士意旨，大興土木，將省府辦公之地遷此。夏在高興之餘，竟將這位風水先生任命到鄂西一個縣出任縣長。

不知蔣鼎文在薦舉夏斗寅之前是不是還聽到過另外一種風聲，即唐生智反蔣時，非常看重夏斗寅的實力，並以「護黨救國軍討蔣前敵總指揮」一職（一說為十六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相授，夏見唐生智如此器重於他，舉棋不定，頗感猶豫，擁蔣擁唐，遲疑不決。正當他躊躇徘徊，欲借占卜問卦決定倒向哪一方之時，蔣介石任命其為討伐唐生智的「右翼軍總指揮」的命令正式下達，夏

1 《鄭洞國回憶錄》，團結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五八頁。

認為這是上天給他的選擇，由此他擁護蔣討唐的決心下定，於是名正言順地指揮起中央軍三個主力師來。其時的夏頓感風光無限，自尊心得到極大滿足，他認為蔣介石把他當作自己人了。

從此夏斗寅忠心耿耿地追隨蔣介石，在稍後的中原大戰中，夏部又納入蔣鼎文的序列，只不過這次指揮權是易位了。

對此，時任十三師三十七旅旅長的萬耀煌如此回憶：

十三師駐漢口辦事處的人，因夏師長態度模稜，也難免猜疑，再加上漢口的謠言蜂起，則更使他們顯出偷偷摸摸的樣子了……假若十三師變了，趙觀濤的第六師必受影響，原來劉峙已派第六師監視我的三十七旅，因為中央已知道唐生智早把夏斗寅編入戰鬥序列，並擴編為十六軍，而且夏也派人去唐處接洽過。我在廣水師部時，曾接到唐生智來電問軍長的旗幟和印信送到哪裡去。

為什麼說十三師若變，第六師也會受影響呢？這要從葉煥舟說起。葉號南帆，原是第六師的老團長，後來蔣百里派他到唐生智處，此時正代表唐生智和蔣百里赴第六師說，他對趙觀濤說：「我們都是浙江人，蔣介石是浙江人，我們沒有不愛護蔣公的道理。可是還有一個蔣百里先生也是浙江人。蔣百里先生對蔣公之愛護也是無以復加，而今日竟指導唐生智反蔣，其意義之深刻，你們可以想想吧。」聽了他的這番話，第六師的軍官們就商量何去何從，因為團長都是保定的同學，而又都是浙江人，所以很難下決定，遂決議看十三師的態度而定，也就是說看萬旅長的意志而定。這些事，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第六師既見第三十七旅和他們一起行動極融洽，

毫無提防戒備，而且我又坐車先走了，一點都不像要叛變的樣子，也就定下心了。

當時蔣百里師有電致唐說：「東不如西。」意思是叫唐西去靠攏馮玉祥以保持西北的局面，此事劉文島最清楚。為此，事後蔣百里被關了二年。¹

在蔣軍各部由南向北攻之時，蔣介石又策動閻錫山的晉軍自北向南進攻盤踞於鄭州、許昌之唐生智部，計畫將唐生智圍殲於平漢線。

蔣鼎文親率第九師全力推進，於十二月十二日北出武勝關，至二十日進抵河南境內長台關。其時河南遭遇非常天氣，天寒地凍，風雪載途，行軍打仗極為困難。唐生智部多為三湘子弟，久戍北方，為嚴寒所逼，急欲南歸兩湖，思鄉之情勝於他部，劉興、龔浩諸將所率唐部久經戰陣，再加其時強勁的順風之勢，戰鬥力益加倍增，在如此背景之下，兩軍強強相碰，戰況甚為激烈，雙方死傷枕藉。至二十三日，蔣鼎文第九師李延年旅首先攻克確山縣城，其後雙方互有攻守，往來拉鋸，陣地幾度易手，但戰至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唐軍終於不支，已呈敗象。

適圍攻唐生智的楊虎城所部派馮欽哉由南陽向東挺擊至駐馬店，致使唐生智一時不分敵我，還以為是友軍。馮欽哉繳獲了不少武器，實力得到提升。兩部夾擊之下，唐手下大將劉、龔兩軍雖可支援於一時，不過被圍殲亦只是時間而已。蔣鼎文見勸降時機已到，乃用無線電明告劉、龔兩將，勸其認清形勢，明瞭大義，儘早投誠，如再作無謂抵抗，則將全被消滅。劉、龔兩將相與商議，也

¹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九九—二〇〇頁。

顧不得報告唐生智，乃派出代表與蔣鼎文談判，會商善後辦法。蔣鼎文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要劉、龔將所部開到平漢線沿漯河鐵路以南，將所有列車停在宿營地附近，以連為單位，把武器分門別類，由連長率領送到車上，然後徒步離開，聽候編遣。這一仗總計投誠官兵一萬六千多人。

戰果不可謂不輝煌，然蔣鼎文對於討唐之役，因天氣原因導致部隊嚴重自然減員的慘況，三十多年以後回憶起來還心有餘悸：「征討唐生智的一仗是我擔任軍人中最艱苦的一仗，我部與唐軍在許昌附近展開激烈的爭奪戰，天降大雪，寒冷異常，官兵因凍瘡而死的無法計算外，被凍斷手足的就有幾千人，至為淒慘。」¹

對此，參與此役的萬耀煌也有描述：

時屆隆冬，天降大雪，為數十年所僅見，雪地裡築工事極苦，剛挖好了土，馬上又給雪蓋住了，行軍頂著北風，路又全被大雪淹沒，無法分辨，給養運不到，無食物又無宿處，士兵受凍受餓，病患甚多。大雪一連下了幾天，雪深一二尺，甚至有些地方，人陷進去就不容易爬出來，真是比沙漠行軍還苦幾倍……唐部主力是龔浩與劉興，兩部作戰力很強，而且是順風，我十三師四個團當其正面，是逆風，冒著雪攻防，眼睛都睜不開，所以作戰極為艱苦，幾晝夜下來死傷枕藉。左翼秀山陣地是最艱苦的地帶。敵人山頭陣地高過我方秀山陣地，可以俯擊，我方則為仰攻，受敵方炮火控制，攻既不可，退亦不能，這一帶遂成敵我作戰焦點，我方傷亡了連長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八頁。

七人，排長十七人，士兵每天都死亡數十人。¹

至一月上旬，在南京中央軍和閻錫山晉軍的南北夾擊之下，僅一個多月時間，唐生智苦心經營的大部隊就土崩瓦解，全部繳械。唐生智本人也化裝後逃往天津租界。

三月十七日，蔣介石電令蔣鼎文固守武漢防線。

自一九二九年三月至次年初，蔣鼎文率部打了多場硬仗、惡仗，其指揮才幹、統兵能力得到長足的提升。不僅如此，蔣鼎文的眼光已超越軍人的角度，禮讓何成濬，推舉夏斗寅，進言蔣介石，廣交雜牌系，顯然從全域視野考慮問題，且不計個人得失進退，只要中央軍獲勝就行。這種進退方寸的適度，或已得蔣介石部分之精髓，儼然有政治家之風。當然這也是「肉食者謀之」的共通之道。正因為經過如此多次的考驗，蔣鼎文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青睞。

時任第一軍軍長的顧祝同多年後對此曾有評述：

銘三先生為國柱石，所建功業，宜炳丹青，無俟縷述，茲述其沖襟偉略，為吾人最所欽服者數事：民國十八年，武漢初定，統帥擬設總司令行營，以先生為主任（蔣禮讓，舉何成濬出任）。並著鄂軍夏斗寅隸屬指揮，時夏之兵力及戰功俱遠不逮先生，而先生念正當用兵，為聯合友軍協力，請辭指揮，並轉請隸夏指揮，師克在和，終立大功……²

1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〇〇—二〇一頁。

2 臺灣《顧祝同將軍紀念集》，一九八八年印行，第三三三頁。

一九二九年是中國變亂迭起、兵燹彌漫的一年。自年初至歲末，刀光劍影，戰亂不斷，內戰的槍炮聲幾乎響徹中國，千千萬萬民眾無端遭殃，一個又一個貧窮子弟失去鮮活的生命。民不聊生，餓殍載途，各方政治人物卻窮兵黷武，久戰不厭。蔣介石南京政府的中央軍集各種資源於一身，縱橫捭闔，無往不勝；李宗仁、張發奎、馮玉祥、石友三、唐生智、閻錫山、張學良等或被打敗，或被收買，然他們依然割據自雄，勢力未衰，表面順從，暗裡窺測，時而虛與委蛇，時而左右逢源，厲兵秣馬，徐圖再起，問鼎中原，推翻蔣介石的「雄心壯志」，一待時機成熟，他們馬上會干戈勁舞，再掀風雲波濤。

多災多難的中國，尚未來得及喘息，轉瞬之間，又將迎來一場比以往更加猛烈的疾風暴雨式的戰火雷電。